

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 日人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

黃美娥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探討的焦點，乃攸關於近代東亞國家中，台灣、日本、中國之間的漢文學及其關係性問題。而在面對上述狀況時，筆者發現因為日本「南進」政策所致，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基於特殊地緣位置，極易引起漢文跨界移動現象。當時不僅曾經出現大批來台漢文人，甚至若干除了停留在台灣之外，有些還會前進中國，特別是鄰近台灣的福建地區，遂使彼此之間的漢文學有了接觸互動經驗。那麼，做為日本漢文人，當其憑藉著帝國漢文的「同文」能力而南進時，其在台灣、福建這些就日本而言的「南方」之地，又會發揮何等「同文」功效與性能？與閩、台之間彼此交錯的漢文關係鏡像，會是怎樣的面貌？漢文如何想像、再現在南方時的旅行體驗，以及文化感受與國族認同？本文在此擬以日人佐倉孫三（サクラマゴゾウ，1861-1941，號達山）為例，透過其人相關書寫來加以剖析與說明。

關鍵詞：佐倉孫三、台灣、中國、日本、福建、南方書寫

*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戰、亂及其後：歷史記憶、文學想像與文化轉型——戰爭與東亞漢文：「帝國」與「區域」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1895-1945）〉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99-2410-H-002-100-NY2，承蒙補助，謹致謝忱。又，在蒐集本文文獻史料與撰稿期間，曾經得到川邊雄大、溫席昕、魏亦均等人之協助，另2013.10.12-13參加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的「全球化下的南方書寫：文化場域與書寫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本文初稿時，擔任講評人的游勝冠教授亦曾給予許多修改建議，以及投稿本刊又獲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表達謝意。

The Observation on “the South” and Practices of Imperial Han-wen:

Taiwan and Fujian’s Writings of Magozo Sakura

Huang Mei-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Han-wen(漢文) literature and its relational issues in the modern East Asian countries of Taiwan, Japan and China. Due to the “Nanshin-ron policy”(南進政策), and Taiwan’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lonial status from 1985 leading to the Han-wen cross-border movement, there once was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Han-wen literati came to Taiwan. While some of them stayed in Taiwan, even some of them moved forward to China, especially to the Taiwan’s nearby province, Fujian. Consequently, there wer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between the Han-wen litera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Japanese Han-wen literati going to “the south” such as Taiwan and Fujian, with the capability of “same characters” of Imperial Han-wen, what kind of effec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ame characters” they had made, what kind of Han-wen relationship had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and how to show and reappear the travel experience in the south and cultural impact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takes Magozo Sakura’s works as an example to find the answers.

Keywords: Magozo Sakura, Taiwan, China, Japan, Fujian, Southern Writing

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 日人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

一、前言

「語言問題」是東亞國家在近代發展階段之中，曾經共同遭逢過的重大議題，其中除了因應現代化而來的國語生成，還因同時面臨中國漢文或日本日語在各地區的支配、制約與影響關係，導致各國國語與漢文、日語之間，滿佈自我與他者的權力對抗軌跡。是故，語言不只是溝通表達的工具而已，實際也是鬥爭的場域，且會進一步擴及到文學面向的衍異與調整，因此頗堪深思。¹ 針對上述因為漢文、日語延伸出的東亞文學新變狀況，本文在此所特別關注的是，殖民地時期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漢文／漢文學互動接觸，以及因之引發的種種問題。²

回顧西元1895年至1945年間，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雖然漢字在日本國語的確立過程裡，曾以「他者」身分存在於歷史語境中，但因帝國主義擴張所需，漢文弔詭扮演統治台人的最佳「同文」工具，甚且在1937年中、日戰爭後，又成了日支親善論的重要媒介。不僅如此，當日、台間以漢文周旋往來之際，其實也屢屢牽動了中國的漢文問題，而其中原因之一，係由於台灣特殊地緣位置所致。當時來台的日本漢文人群中，後來前往中國進行相關文學活動與

- 1 關於東亞語言問題，特別是各國國語與漢文、日語之間的糾葛關係，東亞學界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筆者曾以「國民·國語·國體」關鍵詞研究方式，為《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策劃專題論文，撰稿者包括安田敏朗、三ツ井崇、王風及本人，分別討論了日本、朝鮮、中國與台灣的語文問題。黃美娥，〈國民·國語·國體專題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63-70。
- 2 個人近年來對於殖民地時期台灣與日本漢文關係甚感興趣，為了進一步探索這段日本在台漢文學史，掌握相關文人在台漢文書寫、創作言論、文學社群、文學活動狀況，以及對台灣漢文場域的衝擊與影響，故一方面在台灣與日本調查、蒐集相關史料，另一方面則是針對若干議題展開研究，迄今已陸續發表〈殖民地時期日人眼中的清代台灣文學〉、〈跨界傳播、同文交混、民族想像：賴山陽在台灣在接受史（1895-1945）〉、〈日、台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台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久保天隨與台灣漢詩壇〉、〈「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台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旅行、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在「同」與「不同」之間：玉山吟社的詩歌空間意義與社群文化生產〉、〈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等文。

書寫創作的頻率頗高，再加上台灣經驗有時也會對於其人的中國書寫，產生比較視野或連結關係，故益發耐人玩味。要再附帶說明的是，其之所以會導致如此情況，實與日本明治中期以後興起的「南進」論述，以及1895年起台灣成為南進起點的地緣政治背景密切攸關；³又，其中同時駐足、停留於台灣與福建者，更不乏其人，故如此遂使得日本漢文繼受帝國南進、乙未割台殖民因素的刺激擾動之後，另外又涉入1898年福建成為日本勢力範圍，以及台灣總督府在福建的「對岸經營」政策波瀾裡，因而構築出台、日、中漢文跨界移動軌跡中的一道特殊風景線，為此，「台灣」與「福建」就變成了日本帝國漢文南進時的重要節點（node）。⁴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以來，有關近現代東亞國家，台灣、日本、中國之間的漢文問題，由於同樣使用了漢文（漢字）之故，因此彼此做為「漢字圈」一環的存在事實，或早期所慣稱的「同文」現象，早已為人所知悉與認可，然而面對「漢字圈」內台灣、日本、中國「漢文／同文」的非均質性和非同一性狀態，卻有著迥異的詮釋框架，以及各有側重的論述趨向。對此，中、日雙方的漢文／漢文學關係，歷來獲得較多的探索，中國學界常由「域外漢學」或「中日文學交流論」的認識論來加以深究，且在著名學者嚴紹盪⁵、張伯偉⁶、王曉

3 邱雅芳參考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所論，指出在明治中期開始，至昭和時期，各種南進論述述出，「南方」成為日本投射帝國的慾望想像，包括官吏、人類學者、詩人、小說家皆是論述翼贊者，他們透過各種文本，包括年鑑、圖書目錄、外交關係資料、雜誌、傳記、地方史、旅行記等，形構了南進論述與日本帝國的南方主義，參見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1、頁5、頁31。此外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第二章〈臺北帝大與學術「南進」〉，也對日本明治時期以後的南進問題多所剖析，同樣可供參考。

4 從「福建」來思考日本帝國漢文南進問題，筆者近作〈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已略作闡發，文刊《台灣文學學報》26期（2015.06），頁1-38。又，有關「節點」此一詞彙，簡單地說，是指一個交會點，其概念被應用於許多領域。例如，就網絡拓樸學而言，指的是網路任何支路的終端，或網路中兩個或更多支路的互連公共點；若就城市空間而言，則是城市構成型態要素之一，包括城市中各種功能的建築物、人流集散點、道路交叉點、廣場，以及具有特徵事物的聚合點；他如交通系統結構來說，是指鐵路、公路、航空、水運或通訊等不同交通路線的交會點，包括起點、終點、轉運站等。本文此處挪用以形容、指涉，台灣與福建位於日本帝國南進路線、網絡中的重要節點角色。

5 嚴紹盪藉由考察中國漢籍在日本的傳播、融受，指出漢文／中國文學傳統，透過「人」的移動，造成了知識與文化的流動；而日本則在「持續不斷的外流文化的轉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構／變異日本文學的傳統。以上詳參〈序論：中日文化交流的歷程與我們的研究〉，嚴紹盪、中西進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學卷》（中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又，關於中國漢文學在日本、東亞的傳播，尚可參考嚴紹盪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03）；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06）；嚴紹盪、劉渤，《中國與東北亞文化交流志》（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等。

平⁷等人的積極推動與努力下，目前成果豐碩。不過，在數量可觀的著述中，雖然不乏倡議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主張，然而多數所見，仍然暗含著主／次、中心／邊陲位階差異思維結構。⁸至於日本方面，相關問題也有不少剖析，這可由加藤周一⁹、子安宣邦¹⁰、小森陽一、安田敏朗、村田雄二郎¹¹、齋藤希史¹²等人，針對漢字與民族主義、國語、方言、現代性之間的複雜糾葛，¹³所

-
- 6 張伯偉乃以「域外」此一框架，詮釋中國漢文在其他國家／地區的交流與知識生產。而「域外漢文」在「域外」一視域下，成了中國文學的支流，遂建置出邊陲與中心的文化／政治秩序。相關論述詳參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5.05）；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0）；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09）。
- 7 王曉平雖同樣以「漢文」作為切入視角，然而，其在「域外」的前提下所試圖討論的是，對抗「歐洲中心主義」的「亞洲漢文學」史／史觀，這除了凸顯中國漢文學於亞洲關鍵性的位置與意義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嘗試藉此與「世界」勾連的企圖。以上詳參〈亞洲漢文學的文化蘊含（代序）〉，王曉平，《亞洲漢文學》（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06）。另外，除了以「漢文」作為考察的基本路徑外，他還關注「翻譯」此一文化／政治行為，對於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文化交流的影響，相關論述可參見王曉平，《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4.04）。
- 8 藉由嚴紹盪，《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06）、《比較文學視野中的日本文化》（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08）；樂黛雲，《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樂黛雲、金絲燕主編，《編年史：中歐跨文化對話（1988-2003）：建設一個多樣而協力的世界》（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9）等著作，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相較於影響論、淵源論的研究進路，藉由「比較文學」此一方法論，探討中國／漢文學傳統與日本、亞洲，乃至世界文學、文化間的類似與差異，可為原有的研究視野帶來反省與深化的契機。然而，在以中國文學／漢文學傳統為中心／主體的視域之下，卻使可能帶有革命、翻轉敘事動力的「比較」視野，淪為另一種探討關係性與淵源論的變形。
- 9 加藤周一從對語言、文化、教育，乃至「近代日本」與世界的關係，切入「漢字文化圈」的討論。其在〈多種語言的必要性〉一文中，提出「多種語言主義」（multilingualism）概念，探討現下世界各國在以「英文」為共同語言，即受英語文化圈所支配的現實下，日本的處境、乃至東亞的未來是什麼？又要如何開展？對此，其在〈漢字文化圈的歷史和未來——與一海知義的對話〉一文中指出，「近代」以前漢字文化圈之成員應要團結一致，重新發揮「漢字」的文化與政治意義，除了與西方霸權抗衡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積極介入世界權力與階級的秩序。以上相關文章皆收入於加藤周一著，彭佳紅譯，《21世紀與中國文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10）。
- 10 子安宣邦「以東亞作為方法」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試圖回應「近代日本」國家與文化間的文化與政治，另一方面則促進了東亞／亞洲思想、文化政治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此方法論背後所指向的其實是在台灣、日本、朝鮮、中國此一「東亞」框架下，人物、思想、文化、經貿，其之所以能產生有機的流動與政治影響力，乃植基於中國的漢文化、漢醫，尤其是「儒學」在東亞各國間的流動、轉化；而此一文化或政治實踐，「漢字」有著無可取代的關鍵性意義。詳參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3.05）；子安宣邦著，陳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
- 11 村田雄二郎藉由「近代」漢字圈的形成與傳播，以回應日本現代性／化之歷程，以及「漢字」在日本以「國族主義」為輻輳核心的「國語／文」建置過程中，所曾扮演的角色與意義。詳參村田雄二郎，《漢字圈的近代》（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09）。
- 12 齋藤希史一方面關注日本漢文與中國間的淵源，另一方面則關心「漢文」如何在日本政治、文化與社會下，在本土化的歷程中被再製與改造的問題。此外，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其亦將視野放置於中國／日本「漢文」與世界文學、文化乃至政治的關係。詳參齋藤希史，《漢文脈的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學圈》（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02）；《漢文脈と近代日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7.02）；《漢文スタイル》（日本東京：羽鳥書店，2010.04）；《漢字世界の地平：私たちにとって文字とは何か》（日本東京：新潮選書，2014.05）。

做出的評論可以得到證明。只是，日人所論大抵是以探索漢字與日本近代文明、國家意識之相生相剋而出發的，亦即具有明顯的日人研究主體位置的自覺性色彩，但此已不同於過去日本史上，慣將中國漢文視為「他者」的排他性文學政治論的思考模式。

相較於中、日學界的論述旨趣，在東亞漢文網絡之中，應該如何評述台灣漢文／漢文學的存在及其角色意義？在目前從事東亞漢文研究的論著中，例如前述多位著名中國學者，當然不會以域外或東亞漢學視之，故未見措意於台灣漢文學的創作表現，迄今主要關切者仍屬「台灣文學」範疇之研究者。¹⁴至於日本方面，雖然小森陽一《日本近代國語批判》、¹⁵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之作，¹⁶已然論及日治時代台灣漢文境況，但其研究動機與目的乃在於留心日本國語「語言論」，而非從「漢文學論」去關照，反倒是從事日本自身漢文學研究的學者，近年開始觸及了日治時代台灣漢文學的研究，此可以森岡緣為代表，¹⁷但整體而言涉獵者仍然極少。那麼，本人既然身為台灣文學研究者，又該如何設法闡明現階段，中、日學者鮮少著墨的台灣漢文／漢文學的存在面貌與內涵？尤其，設若想由「台灣」位置出發，去進行當時台灣與日本、中國之間漢文／漢文學研究關係探討時，又當如何入手？¹⁸其實，最基礎的工作，不只是得積極建構、釐清屬於台灣自身的漢文學發展脈絡歷史，有關台灣與東亞漢文／漢文學關係性的考察，其實也是協助確認台灣漢文／漢文學存在角色意義的重要一環。這同時也是因為，近代東亞在17至19世紀，中國完成明、清兩代交替，以及日本幕藩體制國家形成

13 關於日本朝向「近代」轉進過程中，民族／國族主義如何在「現代性」的驅使下，藉由「國語」塑造「國體」一機制下被生成與鞏固，以及日本從「殖民地帝國」轉向為現代性話語下的「國家」脈絡，漢字／文化與日本「國語」間的扞格、抗詰，乃至轉化等複雜衍繹的過程，可參照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6.03）。

14 例如汪毅夫、朱雙一等人之研究，但二人雖對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有所深究，卻未擴及台、日之間的漢文關係，近期張重崗、彭春凌等人因為從事章太炎個案研究，由於章氏曾經任職臺灣日日新報社，因此開始將台、日跨界接觸視野納入討論。

15 詳參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

16 詳參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日本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12）。

17 參見森岡緣，《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

18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與本人研究關懷頗為近似，一樣探討了台／日／中的漢文關係，且與本人同樣從台灣論述位置出發，不過該書主要鎖定「漢文文體」變化發議，此與本人側重聚焦「漢文學」演變之視角則明顯有別。

之後，亞洲內部一方面有所整合，但另一方面又因共同遭逢西力東漸的強大威脅，導致彼此競爭、合作，故最終發展出一種置身於世界與亞洲內、外部之間，既相親又相斥的新國際／亞洲關係體系。於是，連帶地，「漢文」在近代東亞各地區的發展場域，自是脫離不了此一新變的亞洲新秩序的感覺結構，加上台灣當時與中國、日本，尚有著宗主國、殖民母國的隸屬關係，是故從東亞出發去從事台灣漢文研究的視域選擇，應該有利於取得更為宏觀而深刻的論述結果。

但，究竟要怎樣以「東亞」做為方法論，去研究「台灣」漢文與以之書寫出來的漢文學呢？倘若循著「日本在台漢文學史」、「殖民地時期台、日漢文關係」或「台、日、中漢文跨界接觸」的研究議題與思考理路來看，是否能夠成為一條可以提供了解台灣漢文／漢文學角色意義與發展側面的路徑？基於以上考量，以及想要由小窺大的嘗試，本文發現一位曾經來台，後來去過福州，之後再次返回台灣，最終回到日本的佐倉孫三（サクラマゴゾウ，1861－1941），可能是有利於說明上述現象的絕佳案例。而之所以選擇此人及其作品做為研究對象，其在台灣、福建、日本之間的位移／交錯漢文經驗自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相較於從明治時期以來，曾在台灣留下漢文學作品，計達二、三百個以上的日本漢文人來說，佐倉孫三的漢文表現實際有其殊異性：其一，他比起當時來台日人之以漢詩見長，反而因為專擅漢文寫作而被時人知悉與肯定，且在台作品即以此為大宗；其二，在台期間，曾任警保課課員、鳳山縣警視、打狗警察署長、台南縣辨務署署長、蕃務本署囑託等職，警察身分使其具有較多直接親近台灣風土人情的機會，故寫作別具一格；其三，佐倉後來回到日本之後，因為漢文創作突出表現獲聘為二松學舍講師、教授，故其漢文視域與漢文成果，頗具代表性意義；其四，佐倉氏在福建時期也有不少作品留下，則台、閩兩個「南方」書寫的並存，便成了認知東亞／台灣漢文與日本南進論述／實踐關係的絕佳產物，同時也能因之顯豁佐倉孫三以漢文寫就與表述的「南方」書寫與「南方」印象。且不僅於此，在台灣新文學研究範疇中，日文學的「南方」意象經營，學界已經有所著墨，¹⁹但漢文學部分則仍付諸闕

19 例如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09），與前述邱雅芳博士論文均已探討。

如，故本文有關佐倉孫三的台、閩南方書寫，亦能提供對話、參照的思考。大抵，綜合前述，可知本文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之所在。

至於佐倉孫三其人其作的前行研究，整體而言，相關成果現正逐步累積中。首先，以日本而言，地方志部分，佐倉出生地隸屬的《福島縣史》22卷和《二本松市史》9卷，對於其人和家族人物已有簡單介紹。²⁰ 研究學者部分，筆者所知者有：橫須賀司久《漢詩人列伝》不僅肯定佐倉孫三的漢詩文成就，且對其能憑著一支健筆成為闊步中國的「偉丈夫」感到欽佩，除撰有作家小傳外，又列舉多篇作品，用以彰顯佐倉孫三出色的漢文學造詣；²¹ 吉原達也因為關切日治時期台灣法制問題，故對具有警察身分的佐倉孫三多所留心，因此努力整理佐倉氏的生平事蹟、著述年表，相關情形可見於網路所載，主要係以條列方式列舉各類訊息。²² 另外，川邊雄大特別注意佐倉氏與二松學舍的淵源關係，且因善用二松學舍大學典藏之佐倉「履歷書」與《中洲會誌》，故對佐倉孫三晚年回到二松學舍校擔任講師與教授之事，有了清楚敘述。²³ 在上述之外，西村一之則是從理蕃視角入手，深入剖析了佐倉孫三的相關角色與著述。²⁴ 由上可知，前列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視角，至少包括了文學、法制、教育與理蕃等分析向度。

關於台灣部分，林美容是最重要的開拓者，她的研究角度主要是從民俗學入手，因此格外看重佐倉孫三的風俗著作。她先在2004年，透過〈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一文，對於佐倉孫三生平概況與來台經過做了勾勒，並就《臺風雜記》書籍架構與內容進行解讀，且肯定此書是「日治時期第一本台灣風俗記錄」，也是戰前日人所寫台灣風俗

20 參見吉原達也，〈佐倉孫三氏關係資料一斑——日本統治下臺灣警察史の一齣〉（來源：<http://home.hiroshima-u.ac.jp/tatyoshi/sakura001.pdf>），以及吉原達也，〈佐倉孫三及び湯目補隆両氏の足跡〉（來源：<http://home.hiroshima-u.ac.jp/tatyoshi/sakurayunome.pdf>）。

21 橫須賀司久，《漢詩人列伝》（日本東京：株式會社五月書房，1997.09），頁43-64。

22 同註20。又，此網頁資訊，從筆者2013年查閱迄今，仍在不斷增補中。

23 川邊雄大，〈明治時代の二松學舎生和台灣——以佐倉孫三為中心〉，「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主辦，2008.11.29-30），頁163-166。

24 西村一之，〈蕃務本署調査課と「理蕃」：佐倉孫三を通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人間社会学部》24號（2014），頁17-32。

記錄中唯一用漢文書寫，並以為該書珍貴地記下了清末時期尚未被日人統治前的台灣風俗。²⁵正是基於體認《臺風雜記》的重要文獻意義，2007年她再帶領學生出版《臺風雜記》的白話圖說；²⁶到了2010年，又進一步將佐倉氏的《臺風雜記》與《閩風雜記》中的風俗紀錄加以比較，如此遂更加抬高佐倉所從事的跨文化民俗書寫的價值，且歸納出《閩風雜記》記載較諸《臺風雜記》平實客觀，後者較具主觀感情的結論。²⁷之後，在2013年時，又發表了〈佐倉孫三與臺閩〉短文，認為須將佐倉在台、閩兩地著述合觀，才能完整理解佐倉此一個案。²⁸

至於筆者，係在2009年參加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台灣古典散文會議」時，初次發表〈帝國漢文的跨界移動與交錯——日人佐倉孫三的「同文」想像與實踐〉，文章選由台、日漢文的「同文」關係，去探討佐倉氏在台散文創作，如此遂呈顯了與林美容由民俗入手的不同思考路徑。2012年，個人參與美國華盛頓大學舉辦的「戰·亂及其後——歷史記憶、文學想像與文化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所寫〈帝國漢文的「東亞」視域與「南進」實踐：以日人佐倉孫三為例的探討〉一文，乃繼台、日漢文「同文」問題的思索之後，進一步將佐倉的漢文書寫，放入日本「南進」論述脈絡和「東亞」問題框架中加以評述。到了2013年，應邀參加成功大學舉辦的「全球化下的南方書寫：文化場域與書寫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便發表本文初稿，文章企圖在日本南進歷史語境中，同時聚焦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及其意義，並突顯出台、閩作為日本兩個「南方」之地的地域政治意義。

又，同時期，2013年，廖振富選出佐倉孫三散文7篇及《臺風雜記》12則記錄，收於其所編輯選注的《在台日人漢詩文集》中；²⁹這一年，筆者亦收錄佐倉氏的部分作品，納於《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

25 參見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09），頁13、15。

26 成果即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11）。

27 參見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漢學研究》28卷4期（2010.12），頁261-294。

28 參見林美容，〈佐倉孫三與臺閩〉，《臺灣文獻別冊》46卷（2013.09），頁22-30。

29 參見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台日人漢詩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書中，³⁰所注意的自是其人散文作品與台灣原住民族的密切關係。2014年，由本人指導的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溫席昕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在台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³¹乃從在台日本警察身分，去彰顯佐倉孫三的原住民書寫面向及其意義。

以上，經由前行研究的回顧，可知台、日學界關注焦點。至於本文，如同前述，個人文章與前引林美容論文，不約而同聚焦了佐倉孫三的台、閩書寫；但，二人其實關照有別，筆者更在意佐倉孫三在日、台、中三地往返的東亞漢文學接觸／移動／交流／同文／南進實踐經驗，期盼一探這位日本漢文人，如何憑藉帝國漢文的「同文」能力而在台灣、中國發揮作用？彼之漢文學創作如何想像、再現南方體驗，以及抒發文化感受與國族認同？此外，更希望藉由掌握佐倉孫三的跨界行旅所折射出的東亞漢文交錯關係鏡像，進而裨益理解日治時期台灣與東亞漢文的關連性，和處身日本帝國漢文南進中的境遇，而對此文學軌跡的考掘與拼湊所得，應當有助一窺殖民地時期台灣在東亞漢文學場域的節點角色。

二、佐倉孫三生平及其著作略述

本文研究對象佐倉孫三，名「孫三」，字「誠卿」，³²號「達山」，³³1861年3月18日出生於岩城二本松（今福島縣二本松市），屬二本松藩，父佐倉政行時年三十六，母平島氏年紀不詳，祖父佐倉政忠時年六十。有關佐倉孫三，歷來對其生平所知有限，本文參考諸多文獻及其個人著作內容進行勾勒，撰有年表附錄於後，唯因本文問題意識與篇幅限制，以下無法細究畢

30 黃美娥主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12）。

31 原2014年碩士論文，後已出版為專書，參見溫席昕，《日治時期在台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6）。

32 橫須賀司久，《漢詩人列傳》，頁43。

33 關於其號「達山」之由來，乃因幼時，與群兒角力，常占優勝，人呼曰達山（取其鄉安達太郎山稱之），後來便以此為號，以上參見濟齋山田準，〈佐倉達山傳〉，佐倉孫三，《達山文稿》（日本東京：達山會，1937.04），頁2。此外，佐倉孫三除了「達山」一號之外，可能還有「士誠」之號或字，參見其發表〈雲漢硯記〉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署名，1911.10.03，3版。又，本文引自《達山文稿》或其他報刊、書籍文字，其中存有原文缺乏句讀，或非現代新式標點情形，為利今人閱讀，一律使用新式標點標記；而當時對於原住民之稱謂或言「番」、「蕃」，本文在論述時，為符合當時情況，也會予以沿用，特此說明。

生事蹟與創作軌跡，僅能略加陳述，其餘可詳參年表整理所得。

回顧佐倉孫三幼年時期，家中便遭遇不測，先是在其4歲（1864年）時，父親參與討伐天狗黨之亂而被殺，其後8歲（1868年）又逢祖父於戊辰戰爭中殉難，一時之間頓失羽翼，但父祖佐幕之志卻深植佐倉心中。明治維新之後，其兄佐倉強哉為了立功以償父祖遺志，1877年時參與了西南戰爭之平亂，後隨倒幕事件的終結回京，便奉職警視廳警部補。同年12月，佐倉離鄉往見其兄，兄問志向所在，回應意在：「先修漢學，知聖賢道德之懿，後修洋籍，知當今之務，而上報君恩萬一，下立身顯父祖」，³⁴ 於是在佐倉強哉的建議下，從學於三島中洲（1830-1919）。1878年4月，時年十八，先以走讀生身分進入三島氏創立的漢學塾「二松學舍」就讀，11月錄取為住讀生。20歲（1880）時，在〈自題寫真像後〉自述希望今生能夠成就「大事業」；³⁵ 1883年，撰〈上中洲先生書〉，表達入學五年來之個人感懷，以及要秉承父祖輩報效國家之宏願。³⁶ 1886年，離開學塾，展開人生志業的追尋與奮鬥，相關過程，在其畢生最為重要散文集《達山文稿》〈自序〉中，有極為清楚的交代，茲錄之於下：

余性頑鈍，徒好文章，受中洲夫子之薰陶，應士官學校之試，以不善算數不第，但課題武田信玄論為校長谷中將所稱揚。於是，余謂男子報國，何必武弁？乃釋褐千葉縣為警官，尋轉警視廳、司法省、東京府，皆不得志。臺島之歸我版圖也，率先涉波濤，左劍右筆，致犬馬之勞。任警視，不幸遭鼓盆惡，辭歸為靜岡縣署長、山梨縣郡宰，非其志也。偶應閩省警務學堂之聘，秉鐸之餘暇，著書立說唇齒輔車之急，誤蒙宣統皇帝之嘉賞，賜三等寶星。淹留七星霜，鳥倦飛而知還，構草廬于礫川里，半畝之宅，環堵之室，審容膝之安。時出講早稻田實業、獨逸協會諸校，今則為母校二松學舍教授。³⁷

34 佐倉孫三，〈上中洲先生書〉，《達山文稿》，頁2。

35 佐倉孫三，〈自題寫真像後〉，《達山文稿》，頁22。

36 佐倉孫三，〈上中洲先生書〉，《達山文稿》，頁1。

37 佐倉孫三，〈自序〉，《達山文稿》，未計頁次。

以上文字，指出原本想要發揚父祖遺志致力武弁報國的佐倉孫三，在參加士官學校考試因不善算術而落榜後，轉而出任千葉縣警部補，從此展開一生中的警務生涯。前列敘述，宛如一篇生涯履歷，依序回溯佐倉孫三在日本、台灣與福建等地的任職、出處情形，據此可得知其人曾任警察、官員與教師三職，最後甚且重回從前年少時期的學習之地，獲聘為二松學舍教授。

而參照佐倉之自述，倘若吾人再查考其他線索，就可得知他在來台之前，主要是在千葉縣警部與警視廳警部工作，因為常持長銃出巡，使惡棍潛影，因此還博得「鬼警部」之名。³⁸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於宣布割台的次月，就隨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來台，此後共有兩段時間在台任職，主要負責警務與理蕃工作，合計達八年之久（大約時間1895-1898，1910-1913）。另外，1903年曾轉往福建發展，1909年返日，其間先後就任福建省武備學堂教習、警務學堂總教習二職，曾因功獲宣統皇帝頒贈三等第一雙龍寶星。³⁹ 後來離開福建，回到日本，更加努力講學，1913年先任教早稻田實業學校，又於獨逸協會學校授課，之後專任於二松學舍，1928年二松學舍另立「二松學舍專門學校」，旋應聘為漢文教授。以上，由投身警務起始，最終成為大學漢文教授，這無疑顯示了其人漢文造詣已獲高度肯定，也正因如此的經歷更迭，距離去世僅剩三年，高齡77歲的佐倉孫三回首一生中各種身分與職務時，最讓他引以為傲者，便是看似無用之物，卻積累數十年而執筆不斷的漢文寫作成果。因此在前引《達山文稿》〈自序〉的末段，佐倉自道：「其間所作文一千餘篇，又海外文字數卷，雖粗笨不足觀，皆心血所著，不忍覆瓿。」、「大塊假我以文章，縱橫奮筆，不知老之將至。豈無一言之近於道，與一紙之益乎世乎哉？」字裡行間，可見對於自我文章的自信與自得。

面對佐倉孫三寄情漢文寫作一事，館森鴻在為佐倉氏撰寫序文時，特別有感而發：

達山佐倉君，……少壯力學……枕經籍史，窺其閫奧。恒慕古人偉行，

38 濟齋山田準，〈佐倉達山傳〉，《達山文稿》，頁1。

39 〈清國勳章贈與〉，《臺灣日日新報》，1911.07.07，2版。

而不喜舉業。航臺灣，渡禹域，與賢士名儒遊，上下其議論。至於仗大節明大義，則蹇蹇諤諤，雖權貴不稍顧，是以不容於俗。顛沛困躓，而不能奮見于事業，然志操踔勵，曾不少悔。或任教官，或入末吏，暇輒以讀書擊劍自娛，而平居恂恂如書生。達山立身行道如此，其發為文者，可知也。頃手定平生著稿，……出視稿徵余序。余不肖，嘗論達山之大，其何敢以不文辭。余觀達山文，才思風發，天真爛漫，而感慨激昂，恢奇鬱勃不可端倪，非具英偉之氣，乃得有是哉？鳴聲遠矣！⁴⁰

文中對於佐倉孫三的學養、志向、性情、際遇，以及為文的才思、風格，均有細膩描摹，除了呈顯時人對其漢文書寫之高度讚揚之外，也同時展現了佐倉氏的個人形象。再如山田準〈佐倉達山傳〉一文，則是強調佐倉出身武士家族，故能文武兼資、氣豪而文妙，而寓居福建7年，與當地碩學鴻儒相交，又使文境大進，遂能造就佐倉孫三卓爾之文。⁴¹

那麼，這位從警察變成漢文教授的佐倉孫三，其畢生創作情形如何？其實，若就其人創作類型來看，大致涵蓋報刊作品與單行本作品集。即以前者而言，他在台灣客居期間，便曾發表於《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時報》、《臺灣》、《蕃界》、《孔教報》等，不過其中若干作品後來也被收入單行本的作品集中。總計一生創作數量不少，若就單行本書目而言，大抵如下；而其中，筆者已確知使用語文類別者，則順道標誌於下：

- 1888 7月，《霞城の太刀風：二本松老少年隊の勇戰》由二本松的相原秀郎出版。
- 1891 12月3日，《警士之龜鑑》（和、漢文）由東京知新堂發行。
- 1892 7月14日，《日本尚武論》（和、漢文）由東京教育社出版。依版權頁載，佐倉氏當時正居住在東京市牛込區揚場町14番地。

40 館森鴻，〈達山文稿序〉，《臺灣日日新報》，1912.05.17，5版。

41 濟齋山田準，〈佐倉達山傳〉，《達山文稿》，頁2-3。

- 1893 《山岡鐵舟傳》由普及社出版。
- 1894 2月2日，《國之盤根——安部井翁之傳》（和文）由東京博文堂出版。
- 1903 8月，《臺風雜記》（漢文）由東京國光社出版。
- 1904 1月，《橫綱常陸山》屬自印出版。
- 1904 《閩風雜記》（漢文）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1905 3月，《時務新論》（漢文）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1907 《遊黃檗山記》屬自印小冊出版（漢文）。
- 1911 編纂《治蕃紀功初集》（和文），由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出版。⁴²
- 1926 《武士かたぎ》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 1928 編纂《模範漢文新選》由東京松雲堂書店出版。
- 1928 9月15日，《霞城の太刀風：二本松老少年隊の勇戰》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 1929 《壯烈美譚鈴木巡查》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 1935 12月，《徳川の三舟》由東京康文社出版。
- 1937 4月，《達山文稿》（漢文）由東京達山會出版。
- 1938 9月20日，《談藪》（漢文）由東京達山會出版。

關於前列著作，茲舉數種略加說明，以利掌握其人創作旨趣。例如，專為緝匪遭難的千葉縣巡查鈴木清助而寫的《警士之龜鑑》，當時佐倉奉職同署，事發之後，連續三天「不解衣以侍、蓐亦不及」細心照料，並麴育其孤，後來再以專文記述鈴木清助遭難顛末，進以發揚其人抵死不撓的忠肝義膽與臨死從容不迫的志節。雖然佐倉當時投入警務工作未久便就遭逢此一事件，但他以為鈴木清助的作為足可成為警力的龜鑑，在深受感動之餘，遂有此書之作。再如，《日本尚武論》一書，參考日下部三之介所寫〈跋〉文，可以得知此書精粹所

42 林美容，〈佐倉孫三與臺閩〉，《臺灣文獻別冊》46卷，頁29。

在。〈跋〉文言及：「達山佐倉君，著日本尚武論，來訪余，披而覽之，先說我邦古昔尚武之風，終及方今尚武之急，陷陷（案：疑為「培培」之誤）數萬言，皆發於肺肝之中，立論剴切，筆力雄大，至其罵小黨分裂之弊，論國權擴張之要，慷慨悲憤，意氣鬱勃，使人不覺拍節三嘆矣！」⁴³由此可見佐倉孫三對武事教育之看重，以及對國家時局的高度關注。

他如《臺風雜記》與《閩風雜記》，均係公餘記錄台、閩兩地風俗之作，二書當時皆獲時人好評。前者有後藤新平作序稱讚：

聞君曾奉職茲土，或提劍探匪類之窟、或執筆草諭示之文，備嘗艱險，面胸中尚有餘地，其所入耳觸眼者悉記以為一冊子，此著即是也。因憶邦人之或奉職此地、或以事來遊者，一旦辭去，則漫然成語，曰：『彼風土真可厭矣』！曰：『當局措置多誤計矣』！甚則空中構樓閣，以為指彈之具，取快於一時；而其能記述真相實意之所存、以供世之參考者，寥寥如晨星，是余之所深遺憾也。今此書一出，則真相實趣之所在，炳然呈露，而從來抱持謬見者釋然冰漸，廓然洞開；然而此著之美舉可以見矣。⁴⁴

從序文中可知後藤新平與佐倉孫三並未在台灣相見或共事過，但對此書卻給予高度評價，先是指出本書之作，是在佐倉「提劍探匪窟、執筆草諭示」歷盡艱險的處境下完成，且是入耳觸眼的記錄所得，因此能夠提供台灣的「真相實趣」，並對若干有關台灣的漫論謬見予以針砭。至於《閩風雜記》，爵南生〈閩風雜記序〉也多所稱頌：

吾友達山佐倉君，昨秋來應武備學堂聘，任教習事，公餘之暇，觸目詠懷，哀然成帙，名曰閩風雜記。舉凡山川之奇狀，閭巷之俚談，靡不刻意描摹，悉心鏤繪，務使讀者心曠神怡而後已。夫欲卜一國之盛衰文野者，不觀其山川之險易，與夫風俗之澆淳，烏知其民人意思情態之所

43 日下部三之介，〈跋〉，佐倉孫三，《日本尚武論》（日本東京：東京教育社，1892.07），頁2。

44 後藤新平，〈後藤序〉，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南投：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3。

著，邦土厚薄豐歉之所判哉！是篇雖紀遊觀，實可探治化之源，君之用心亦良切矣！……我邦與支那，自古稱為與國，不但同文同種而已，其制度文物，亦往往相似，是宜如何講信脩睦，守望相助，休戚相關，以固其根蒂哉！於時而有此間中瑣記，其有裨於後來者匪淺！⁴⁵

此處寫序者概述了《閩風雜記》的內容面向，認為所記包括山川奇狀、閩巷俚談，而這些看似佐倉孫三的遊觀筆記，實際可睹一國文野盛衰，且可因之一探治化之源，箇中甚至寄寓著作者對同文同種的中國，用心良切的觀察與建言，故能有益於未來。顯然，《臺風雜記》與《閩風雜記》這兩本記錄風俗之書，皆被時人視為是裨益政治之良方，而這也正是佐倉孫三在台灣、福建此等具有「同文」之誼地方的漢文寫作，其所蘊藏的微妙深意。

而另一部也隱含強烈政治意涵的漢文著作即《時務新論》，此書是有感於「天賦大帝國，而萎靡不振者，蓋不為也，非不能也」，⁴⁶ 因此秉持區區之誠，希望批陳利害所存，進以作為清國未來謀求改進、提升之參考。至於可能是晚年最後一部作品的《談藪》，書寫時佐倉已經年高七十有八，卻仍然不忘以筆向日人示警，其在〈自序〉寫到：

嗚呼！今則是何之時，皇師暴露于外，國民賑恤于內，戰線日擴，大事所歸，果在何日？思之思之，嫠婦不恤緯，況志士仁人，豈安居逸樂之秋乎？迂生雖既老矣，亦皇國之一民，豈徒食粟而已者乎！……而既超古稀八歲，餘命不足惜，唯一日生，則有一日之責；半日存，則有半日之務，況國事維艱，豈悠悠與草木同朽，與流水俱逝而可乎？因春初著慨世餘言，三論蔣介石，勸降服；三上首相，披陳鄙見，猶不能安焉。起稿於前月，呵筆飛墨，至今日而脫稿，設題凡一百五十，就近古名士之言行，而敘之評之，私題曰：『談藪』。……嗚呼，皇威之發揚如此其大，人材之用途如此其廣，當此時，欲出國家有用之士，則不可不鑑

45 爵南生，〈閩風雜記序〉，佐倉孫三，《閩風雜記》（中國福州：美華書局，1904），頁1-2。

46 佐倉孫三，〈自序〉，《時務新論》（中國福州：美華書局，1905.03），頁1。

先哲之言行以養其才德，欲養其才德，則不若取範於近古之名士，是鄙著之所以不可已也。⁴⁷

顯然隨著中、日戰爭增溫，佐倉的漢文書寫，也就有了更為明顯的日本本位思考，甚至是軍國主義色彩，而此時所寫漢文作品乃為強化日本國魂、國體論而為。

以上，透過前述諸作，⁴⁸可知對於道德、國家與武道之關注，是佐倉孫三畢生著作的主要旨趣所在，故其文非如一般文學家之遣懷記遊之作，而更如其學生所述「多關於經世之作」，且往往具有強烈政治關懷。而除此之外，以下要再補述佐倉氏家世背景與受學經驗，指出二者對於其人漢文書寫的可能刺激、影響意義。

因為出身二松藩的武士家庭，父親曾經討伐天狗黨之亂，祖父則是參與了戊辰戰爭，故在親人對幕府高度效忠的精神感召下，佐倉既對過去以來幕府素為重視的儒道傳統多所看重，尤其是陽明學派，而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現實生活中則是自始至終對國家時局十分關注。此外，因為出身緣故，雖然其欲應士官學校之試而未第，無法繼承祖父、父親職志成為軍人，但卻非常強調武道之重要性，並且致力彰顯武勇精神與武士道，甚至寫有專著《日本尚武論》予以頌揚。是以，重武而愛國的素志，便清楚展現在作品之中，就如前述其友濟齋山田便以為佐倉之文「意氣甚豪」，且展示了「文武兼資」之力。

至於在受學經驗上，根據佐倉孫三對於其兄所述，原本就欲「先修漢學、後修洋籍」而進入了二松學舍就讀，拜在三島中洲門下。事實上，二松學舍課程訓練也的確如此，茲列出《二松學舍舍則》部分內容：

漢學之目的在於修己治人，成為有用之人，課以經書，因儒生須知仁義道德，非記誦詞章。課以歷史，因須知時勢之變遷、制度之沿革，長於變通。課以文章，因應用其學於事業時，文章必須倡達。若不遇而無法施於事業，則可借其文章傳其所學，供天下後世之用。故文章無關乎遇

47 佐倉孫三，〈自序〉，《談藪》（日本東京：達山會，1938.09），頁1。

48 關於佐倉孫三著作，筆者所見主要從日本國會圖書館、二松學舍大學圖書館和神保町舊書街而來。

與不遇，乃活用所學之器也，必學之方可。課以諸子文集，因可取軌範於古今。詩非必要，卻為文章之一端，用以言志，故不可廢。於是經史子集及詩文，諸課皆備，唯祈學生為天地有用之人矣。……今也洋學大行，其於窮理法律技術等精密處，非漢學所能及。故志於有用之學者，亦可兼學洋籍矣。因之所課者乃簡易之漢學，以為洋漢兼學者留餘地，而望專習漢學者，亦可涉獵群書。⁴⁹

於此可見二松學舍所重漢學，在於培育學生知曉仁義道德，修己治人，而非流於記誦，且需洞悉時勢變遷，此一學習宗旨與目標，佐倉氏均已力求體踐在創作內容大要與精神追求。尤其，舍則所謂「若不遇而無法施於事業」，便可借文章傳學以供天下後世之用，這對於懷才不遇，「任教官、入末吏」的佐倉孫三而言，更是成為可以表述志向與弘思的利器，於是其人漢文創作自然成為經世論述、治國良策。再者，不因漢學而廢棄洋學的治學態度，說明了具備泰西知識之必要性，日後佐倉在撰寫《臺風雜記》或《時務新論》時，往往能從泰西、日本、中國之民俗文化比較論著眼，進以評斷台灣民俗之特殊意義，甚至從西洋、東亞與世界時勢來論清國未來命運，其人視域應是漢學與洋學並重的知識生產結果。另外，二松學舍重文而以詩非必要的立場，也深深影響佐倉孫三，蓋其人一生實際以文作為主，詩歌數量甚少，應當也與此有關。

三、兩個南方書寫

在進行了上述有關佐倉孫三個人生平、著作情形與知識養成背景的簡單說明之後，以下要針對本文問題意識，剖析佐倉氏的兩個「南方」行旅與台／日／中漢文書寫之間的複雜糾葛關係。而所謂「南方」，乃指日本以南的土地與群島，此處關注焦點為台灣與福州，這兩處在佐倉孫三到達之際，一隸屬於日本殖民地，一成為日本帝國勢力範圍，因此兩個「南方」，都是日本擴張帝國領土的區域，亦即「南進」方針實踐的一部份。那麼，在如此的政治氛圍下，

49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其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頁292。

佐倉孫三如何以漢文描述「自我」與觀察「南方」？「南方」又會成為怎樣的殊異空間？

（一）台灣

有關佐倉孫三來台時間，前後共有兩個階段，其一是在1895年隨總督樺山資紀來台至1898年止，其二是在1910年至1913年間。⁵⁰這兩段時間，於第一階段時，他擔任過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員、民政局內務部警保課高等警察掛長、鳳山縣警視、打狗警察署長、台南縣辦務署長；第二階段則任職蕃務本署囑託。因為職務緣故，如其在第一階段任職民政局內務部警保課高等警察掛長時，就曾與警部同仁前往石碇街、坪林、深坑查探地方治安和百姓歸順情況，故使他有機會在日本領台之初就深入台灣地方，親身接觸百姓風土民情，這對他撰寫《臺風雜記》時，提供了「足踏其地、目睹其物」的機會，而後才能洋洋灑灑羅列出「台灣風候人情之所異」以致於「土地所生物產」，共百餘題。⁵¹而在第二階段的職務，則曾調查過桃園、台北兩廳隘勇線，並由桃園大料嵌一路北上，至新店屈尺，然後返歸台北，此次山區理番勘查經驗，促使其人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相關居住空間與治理問題格外有感。

正因為如此，佐倉孫三所寫漢文，與當時許多日本在台漢文人之題材與視野大不相同，其所關心者主要側重於台人風俗民情與原住民問題。而事實上，在第一階段來台時，他除了參與過玉山吟社的一次詩會活動外，未見出現在台人或日人藝文活動的訊息報導中。到了第二階段，才見參加書畫團體「羅漢會」⁵²活動，並為在台日人撰寫若干記、序與應酬文字，顯示人際往來轉趨熱

50 有關來台細節與當時台灣所見所感景況的描述，除了本文以下所關注的若干漢文書寫之外，佐倉孫三另尚有日文作品〈十五年前的夢〉、〈十六年前的夢〉、〈三十七年前的夢〉、〈領臺後に於ける五大變化〉可供參看。至於這幾篇日文文章所刻畫佐倉孫三來台情形，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已有若干闡發。

51 參見後藤新平序文所述，《臺風雜記》，頁3。

52 1910年山本竟山（總督府囑託，書法家）發起成立「羅漢會」，以每月第一休日聚會，參見〈八日の羅漢會〉，《臺灣日日新報》，1911.01.10，7版；又，參與者除佐倉孫三之外，尚有西蘭山、須賀蓬城、河原栢年、堤錦江、川田墨鳳、水谷虛堂、伊阪胡山、大久保石壽、松田寄山、藤岡豐秋、田能村小竹等書畫家。另外，佐倉與山本竟三、尾崎白水、中瀨溫岳、館森袖海、須賀蓬城等人，因書法有名而列入台北書畫界中的一員，參見流石本島，〈臺北の書畫界〉的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10.9.29，5版。

絡。但整體而言，除書畫活動外，佐倉孫山較少參與一般性之詩文活動，且與其互動往來者率為日本文人，未見其與台籍文士相唱和，僅見一次以「社外」身分參加瀛社徵稿活動。⁵³ 儘管如此，佐倉孫三早已憑藉其人漢文技藝及報刊傳播作用，而為人所留意，在其起初於《臺灣新報》上發表《臺風雜記》時，報上〈綴語誌慕〉便出現了如下文字：「佐倉達山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每於新報上讀其序記一切雜著，皆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言，而風雲月露，未嘗惹其筆觸，洵一代有心人也。陋生披覽之餘，曷禁瓣香祝之。」⁵⁴ 顯然佐倉漢文文字及其所述內容，早在來台之初，就已獲致相當程度的共鳴，並且注意到佐倉之作都是關於世道人心，乃是一個「有心人」。

實際上，做為一個「有心人」，也展現在佐倉孫三對於在台灣報刊發表作品一事上。參照他發表在台灣報刊上百餘則創作來看，他無疑地展現了高度興趣，且其前後署名曾使用過達山髯史、佐倉孫三、達山子、達山居士、達山學人、達山生、佐倉達三等名稱。由此可知，佐倉氏的台灣漢文／同文接觸之旅，主要不是藉由人與人的當面聯繫溝通來進行，而主要是透過報刊發表作品來展開的。

那麼，佐倉孫三的在台漢文書寫或台灣書寫，有何特殊之處？從其第一階段作品來看，所寫有《臺風雜記》、〈望雪記〉、〈送總督府員赴於紅頭嶼序〉、〈祭深岬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題獨眼將軍影像〉、〈示橐駝師書〉、〈江瀨亭玉山吟社丁酉餞年雅集序〉、〈芝山巖殉難六君三週年祭祭文〉等文，藉之可以一窺其人對於台灣的認知與觀感。例如〈望雪記〉寫及1897年1月18日大屯山下雪，該文敘述第一次來台望雪的感受，在指出台、日氣候差異之餘，更以為台灣今年有雪，喜其更為豐年之瑞徵，故《臺灣新報》之點評者讚許其心中存有至誠博愛。⁵⁵ 又如〈送總督府員赴於紅頭嶼序〉、〈祭深岬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作品顯示台灣成為日人學術調查探險之

53 《臺灣日日新報》，1912.2.16，5版。案：瀛社在1912年1月底時曾召開擊鉢吟會，題目為〈鎮南山臨濟寺護國禪寺創成記憶藤園將軍〉、〈懷安番通事吳鳳君〉，後佐倉孫三以「社外」身分刊稿，但改題為〈讀吳鳳傳〉，且非撰詩，而係散文之作，而這篇讀後心得可能源於稍早之前《臺灣日日新報》曾載〈吳鳳傳〉而來。

54 蟪寄生，〈綴語誌慕〉，《臺灣新報》，1897.02.25，1版。

55 佐倉達山，〈望雪記〉，《臺灣新報》，1897.02.13，1版。

新天地，但日人也得面對重重危機四起，即以〈祭深崛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為例：

本邦人在台島或罹厄難，或斃疾病，其可悼可弔者何限？而其最悲慘刺擊心胸，竭盡淚液者，莫若於深崛大尉、原林學士諸子之死焉。聞諸子受鐵路探險之命，以今年一月十八日自埔里社深入蕃地，過哆囉咕蕃，入木瓜蕃，跋涉山川，測度嶮易，將有所復命。偶東海岸花蓮港大魯閣蕃社激動抗官，軍勢甚烈，而諸子一行未及知之，進到合歡山下，遭蕃奴掩擊，大尉以下十有二名併命焉。⁵⁶

在這篇祭文中，說明了深崛大尉、原林學士等人的死因，以及傳達了台灣島上各地原住民的莫逆難測，令人畏懼驚駭。但，究竟要如何才能倖免於難？這對於來台從事各式探險的日人，實是生命交關的莫大考驗。只是，台灣這個南方之地，對於原住民感到害怕者，不單是新來的日人而已，於《臺風雜記》〈生番〉一則中，佐倉提到在巡視宜蘭時，經過羅東，土人報告有生番偷襲民家，共有八人被殺，經佐倉一探，發現「家眷八口，橫屍相枕，皆無首級；碧血淋漓，腥氣撲鼻」。⁵⁷ 所以，對於身為首批入台維持地方秩序者而言，當置身此一境地時，所面對的可能不是殖民者的征服、統治之喜，而更是肩負重荷的焦慮與不安，正如佐倉孫三之嘆：「嗚呼！余先眾赴臺，屢冒危險，或為土匪所圍，或為瘴厲所侵，或挖掘同僚之屍體，終則喪糟糠之妻，留臺僅三歲，其變化遷轉，不可名狀。」⁵⁸ 在台人抵抗包圍，與瘴厲之氣的侵襲下，台灣成了險境、困境所在，更使他在短短三年期間，不只挖掘過同儕屍體，甚且還面臨妻子病死異鄉的打擊。

在這種情形之下來看待在佐倉孫三來台第一階段中，最為重要的《臺風雜記》，從起初報上刊載，到1903年於日本正式結集出版，就作者創作與成書動機而言，則不單昭示佐倉孫三個人對於台灣風土的陌生與好奇，甚且展現了他

56 〈祭深崛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臺灣新報》，1897.08.22，1版。

57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56-57。

58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56-57。

對南方台灣險困空間感覺的力求克服，⁵⁹ 以及承受妻子死亡之苦的毅力。這份佐倉自況寫於公務之餘，「摘記人情、習俗、家情、產物等與我本土相異者」之作，實際需要相當大的理性觀察、分析，對於出身武士家庭，始終懷抱忠君報國理想的作者而言，或許「以供施政資料」的強烈目的與使命感，才是本書最終能夠完稿、付梓的最大動力來源。

至於《臺風雜記》一書，係採取散文筆記體書寫之作，主體內容包括兩部分：一是佐倉之文，另一部份是橋本矯堂、細田劍堂、山田濟齋及《臺灣新報》台人某氏之評述。內容主要敘述漢人習俗，包括〈婦女纏足〉、〈鴉烟〉、〈娶妻〉、〈婚儀〉、〈贈物〉、〈墓地〉、〈僧侶〉、〈盂蘭會〉、〈端午〉、〈城隍廟〉、〈浴場〉等；原住民者有〈生番〉以及附尾的〈結婚〉、〈醫藥〉、〈番踊〉、〈番酒〉，全書共114則，⁶⁰ 大致涵蓋了台灣衣食住行、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婚喪喜慶、日常生活、風俗習慣、文化現象、男女性別、物產器皿等議題。由於清末臺灣通志局主持的《臺灣通志稿》，稿未成便逢乙未割台，因此《臺風雜記》在林美容眼中成為觀察「清末台灣舊俗，也就是還未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影響以前的台灣風俗本貌」的重要民俗文獻；⁶¹ 歷史學者夏德儀則是體認到其中存有：「使我們知道日人剛據台灣不久就已著手種種的改革和經營了」的意義。⁶² 簡言之，《臺風雜記》具有保存、反映清末到日治初期台灣民俗與歷史的意義。不過，《臺風雜記》終究是以「民俗」記錄為本體，因此對於其中的民俗討論與描述，自然更值得玩味。

那麼，此書究竟如何評述台灣風俗？其中，固然出現過清國陋俗影響論，但書中更是不乏清國／日本／泰西文化的比較視野；而這些異文化，在佐倉的比較中，包括日本文化，其實互有優劣，因此《臺風雜記》所述猶有其客觀性，並未全然淪為殖民者文化優位的專制性詮釋與評斷。只是，因為考量台灣

59 佐倉孫三對於台灣的適應，也展現在飲食方面：「余始來此土，登其所謂『支那料理店者』，桌上所排列食品，皆用油熬煮，雖美則美，既厭其濃厚，即罵曰：『是非食穀，食油也。』今也慣習久，而油熬下物，適腸胃，可謂奇矣。」詳參《臺風雜記》，頁35。

60 夏德儀之統計，參見百吉，〈弁言〉，《臺風雜記》，頁1。

61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卷3期，頁15。

62 百吉，〈弁言〉，《臺風雜記》，頁3。

已入日本版圖，故在論及若干日人引入之新措施或作為時，就不免出現較為稱許的說法，例如〈不潔〉：「然邦人來本島以來，大致力於街衢清潔法，……比之昔日街衢塵埃縱橫之狀，其懸絕果如何！」；〈醫生〉：「本島人之入我版圖也，總督府先設醫院於各地，大施其術，起癘回死，不可勝數。然而台人中亦未信日醫者，蓋拘於古而不通今者，是可憫矣！」其次，佐倉在提及衛生、清潔、產婆術時，以為是偏屬歐美人士的文明開化之事，顯示對於泰西現代文明的肯定；但，在〈耶穌教〉中：「余曾觀台人坐叛逆罪處斬首刑者，蓋從容就死，毫無鄙怯之態，竊怪焉。自今日思之，知宗教之力居多矣。苟有豪傑之士，大興皇道，而養成我尚武廉恥之風，則其可觀者，豈唯止於此乎哉！」則認為日本皇道的尚武廉恥之風，會比泰西耶穌教的宗教之力，更能培育人民從容就死的精神，於此又隱然有東洋勝過泰西之意。則如此看來，泰西與東洋，並非絕對差異與對立，也非純粹一優一劣，而需更辯證看待。

以上簡述了第一階段佐倉孫三在台漢文書寫的創作旨趣，至於第二階段來台之作，相較前一階段數量增加不少，至少可見〈登插天山記〉、〈論臺島蕃族〉、⁶³〈薰風館記〉、〈警部飛田君碑〉、〈送安江五溪游清國序〉、〈羅漢會記〉、〈鳳庵記〉、〈山豬說〉、〈題寒月照梅花圖〉、〈大東書畫帖序〉、〈觀新築保險會社記〉、〈書沈南蘋畫幅後〉、〈霧社紀行〉、〈送畫伯新井洞嚴遊宜蘭序〉、〈對星山房記〉、〈詠沂園記〉、〈香雪庵記〉、〈石坂文庫記〉、〈讀吳鳳傳〉、〈題藤園將軍照像背面〉、〈南山高橋君碑〉、〈水竹書樓記〉、〈警視長倉君碑〉、〈樵石印譜序〉、〈書秋村送別詩文集後〉、〈冰川黑田君碑銘〉、〈紀漆崎大尉從卒市川為市事〉、〈研堂記〉等。

如同第一階段，此際佐倉孫三仍有數篇所述與原住民事務有關。在〈登插天山記〉中，提到了1910年5月25日，出發前往桃園、台北兩廳隘勇線調查之事，他自台北乘汽車到桃園廳，在大科崙一帶，見到滿山都是茶圃，村女淡粧摘著新芽，宛若一幅畫，置身這裡：

63 原題〈論北蕃之氣質〉，後收入《達山文稿》時，更易為〈論臺島蕃族〉。

大科崁街，有支廳，有守備隊，亦山中小都會也。有公園屹立數百仞，形勢雄偉，似信陽川中島。……蕃人蓬頭藍面，穿紅袍而耕鋤，見余輩長揖。到圓山逢長谷川君，座有蓄長髮，穿支那服者，即緒方通譯也。聞蕃人深服此人，稱父不稱名；夫人善操蕃語，教機織，又呼母不呼名。見蕃婦所織布，不甚粗笨，又見蕃童學堂布教所。⁶⁴

他看到大科崁附近蕃人生活情形，以及通譯夫婦與蕃人良好互動。接著一路沿線前進，26日早發降峻坂，見及一路蜿蜒互於山谷，便是隘勇線路。此處：「艾除荊棘，展開射界，繞以鐵線通電氣，即鐵（案，原誤作「錢」）條網也。有哨舍點點相連，即隘寨也。勇丁兩三人執銃而守之。有分遣（案，原誤作「遺」）所配置巡查，有監督所配置警部補。每寨懸警笛，互報緩急，又有電話機通聲息，是隘制之梗概也。」27日衝雨而發，攀爬一險坂，見有老樹彌漫山谷，蒼翠欲滴，便到了檜山分遣所。又繼續前進，抵達插天山監督所時，已經下午二點鐘，但見濃霧罩山，咫尺不辨，作者說此時最怕的是「兇蕃」乘濛霧來襲。而後28日，往觀隘勇操練，29日至30日始到達新店，途中亦不時見到蕃人所設陷阱，以及藤蔓蟠屈、毒蛇猛獸之窟，並耳聞怪禽奇蟲之鳴。總之，佐倉於此仔細陳述了桃園與台北之間隘勇線的情形，和沿線台灣大自然景觀，以及不同區域原住民習性。而這篇文章刊載報上時，山田濟齊許其：「筆致淨而不煩，簡而能盡。抑巡閱隘勇線，事劇往往瀕危殆而作者風流閒雅如此，宜矣其博威信于一方也！」此一評述，指出了佐倉孫三文章所描摹的理蕃空間，其實是「事劇危殆」，但他卻又能流露幾許「風流閒雅」。而之所以能夠如此，關鍵原因正在於佐倉本人的威信足以鎮定、從容面對，顯然眼前雖是埋伏有「兇蕃」的危險空間，但他已經可以駕馭、治理了。

而這一份面對台灣原住民進行「理蕃」的篤定與信心，也越來越加明顯，如其寫於1911年的〈山豬說〉，有謂：

余聞諸博物家，曰豬豕豚皆同種也。其稱豕豚者，山豬之化身耳。但稱

64 〈登插天山記〉，《達山文稿》，頁227-228。

豪豬者，……是別種也。閩里元無豬，有捕山豬者，結柵圍之，投飯養之，繼而皮毛漸纖柔，筋肉漸軟肥，耳目爪牙漸昏鈍，其子其孫，終為純乎家豬矣。由是觀之，化猛獸為馴畜，激馴獸為猛獸，亦不難矣。臺島生蕃兇暴難馴，與山中豪豬何異！然使彼輩棲樓屋，衣輕暖，飽甘醇，且教以禮讓，則其變習遷性，亦何難焉？以理蕃為職志者，豈不深思乎！今歲干支屬辛亥，辛亥山豬也。余有感焉，作之說。⁶⁵

因為辛亥年是豬年，故佐倉由豬起筆，接著更以「豪豬」與「生蕃」相比喻，發表了「化猛獸為馴畜」的「理蕃」方式思考，認為若能使原住民滿足衣食住屋需求，接著再以禮讓之道予以教化，如此就能改造原本的習性。他如〈論臺島蕃族〉、〈讀吳鳳傳〉等文，則以為台島蕃族之能盤踞山中，而未制於外人的原因，主要就在「地峻險要」、「人種勇敢」兩個因素，如果能夠加以引導，自能突破現況。另，在〈讀吳鳳傳〉更倡議：「建理蕃之計者，宜先釋其原由，察其情偽。以愛撫為本，以威力為末，待之以赤心。言必行之，約必履之，使彼感孚我德。而凶暴難馴，獷悍不服者，以干戈懲之。」而於此所謂「愛撫為本，威力為末」、待以赤心的說法，不只是個人之見，無疑也在為日本理蕃大業獻策，因而更加呈現了他的漢文書寫背後所蘊藏的治理信念。⁶⁶

除了上述與台灣原住民有關的作品頗堪咀嚼之外，與前期不同的是，本期還出現了如〈羅漢會記〉、〈題寒月照梅花圖〉、〈大東書畫帖序〉、〈書沈南蘋畫幅後〉、〈樵石印譜序〉、〈冰川黑田君碑銘〉等文，此皆與書畫創作有關，藉此可知第二階段時期的佐倉，相較前一階段有著較多風雅悠閒的時光，而這也同時說明台灣在日人領台十餘年後社會已轉趨安定，日人才會推動風雅活動，享受閒情逸致。相近似的現象與心境，更可由〈薰風館記〉、〈鳳

65 〈山豬說〉，《達山文稿》，頁251。又，佐倉孫三在言及台灣漢人或原住民時，有許多措辭、用語明顯具有帝國主義色彩，如稱未歸順之台人為土匪，勇猛難以應付與對抗的原住民為兇蕃，或此處以山豬比擬原住民等，在本文討論時，理應予以批判，但因為本文文脈與問題意識，乃在考察作為來台日人的代表個案，他以漢文書寫了什麼？又表現了怎樣的統治教化邏輯，乃至在台心境與處境？因此所論便循著佐倉氏的思考理路去表述和詮釋，但這並不代表筆者認同或接受佐倉孫三的意見，特此說明。

66 佐倉孫三有關台灣原住民的書寫甚多，更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見溫席昕，〈日治時期在台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其中頁55-56更有詳列「佐倉孫三台灣報刊原住民相關作品目錄」可供參考。

庵記〉、〈對星山房記〉、〈詠沂園記〉、〈香雪庵記〉、〈水竹書樓記〉等篇來看；這類篇章專就特殊館、房、園、庵、樓等建築進行描寫，其建物的主人，身分多數與理蕃事務有關，或在任或解職，其居所提供一種殊異的生活型態美學，或是被營造成為別有深意的所在，而以此建物折射出的南方意象，反而散發平靜穩定的空間氛圍，一旦透過漢文作品筆力再現，便有些許淡化理蕃艱難險巇之作用。例如〈薰風館記〉，乃桃園廳角板隘監督所，是廳長西君所建，全以樟樹建構，為了提供官民遊息。〈香雪庵記〉，導因於雪山中田君性酷愛梅，常憾台疆氣候極熱不適養梅，所以請新井洞巖作梅花山莊圖，後遂稱其居為「香雪庵」；而自從肩負理蕃重任後，他常藉觀庵中此幅畫作，因而「神自和，氣自暢，悠然有出塵之想」，順利轉化不安情緒。至於〈鳳庵記〉，則是描述一位讓佐倉：「余之服於君者，不在於形骸而在文藝，不在於文藝而在心情矣」，極度佩服的理蕃能士豬口鳳庵之住所，這棟建物的主人，他在從理蕃公務退下之後純然一派「吟詠自適」的「心情」，使佐倉十分敬服。易言之，從害怕原住民到進行理蕃，上述建物的美感意義，展演了這群在台日人，對外在險惡環境的適應與超克，自我心性的安頓與淬練，解職之後的閒退悠哉，故經由對這些關係人住所的書寫，佐倉孫三既向參與理蕃的日人致敬，但也間接形構出這些位於台灣之內的特殊建物的新空間意義。

至此，倘若回溯八年期間佐倉與台灣有關的書寫，可以看到台灣這個距離日本遙遠的南方之島、殖民之域，如何透過一位警察、漢文人的眼光，藉由台灣原住民、風俗民情、自然景觀、人文建物，以漢文書寫顯現帝國主義與邊陲之地交錯後的複數南方印象與意象。台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南方空間？佐倉孫三一方面寫出了罹難者、拓荒者、不安者、殖民者、教化者、超克者的種種形象，促使台灣這個南方空間，承載了離鄉悲苦、統治慾望、冒險精神，但也潛藏著他個人生命隨遇而安、超越挑戰的自我修練與精神涵養。另一方面，又在品評台灣與清國、日本或泰西文化之中，看到台灣自身民情文化的自我特色，但也不忘回應日本殖民台灣的新氣象與新未來，乃至以漢文寫就若干治理台灣或原住民的建言，進而成為「以供施政」的良方。是故，「南方」台灣，從佐倉兩階段創作來看，對於日人而言，應該是個凝聚重層糾葛意義之所在。

然而，即以作者心緒而論，從來台初期的「不安」，到理蕃巡察時能夠「閒雅」成文，這種生命感的變化，無疑暗示了來台日人與台灣之間的距離；而當感知結構有所位移時，何嘗不也是標誌著日本對於台灣掌控力量的愈見強大！亦即，從「漢文」書寫論日人之南進狀態，同樣也能一探端倪。

（二）福州

在結束第一階段台灣工作之後，回到日本的佐倉孫三，於1903年秋天，應聘擔任清國「福建省武備學堂」⁶⁷教習，到了1906年又轉任福州「警務學堂」⁶⁸總教習，直到1909年4月才離職返日；由於「警務學堂」在1909年改成「全閩高等巡警學堂」，故佐倉孫三離閩最後職務為「全閩高等巡警學堂」總教習。⁶⁹回顧這趟福州行，佐倉孫三對於福建軍事教育與警察教育介入甚深，甚至發揮過一定的影響作用。如同前述，他曾獲得宣統皇帝頒贈三等第一雙龍寶星；又，他雖非第一位建議要設福建警務學堂者，但卻遊說有功。根據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所載，1906年警務學堂能夠設置，便與佐倉孫三建言有關，⁷⁰且他後來也成為首位警務學堂的總教習。至於他何以要提議創立警務學堂，引進警察教育？這自然與他過去在日本與台灣長期擔任警務工作，以及在1898年後福建被畫為日本勢力範圍的歷史背景有關。

那麼，其人投身於軍事與警察教育工作的客閩歲月如何？大致上可分由武備學堂與警務學堂任教的兩個階段來談。關於擔任武備學堂教習時的生活情況，亦即佐倉孫三剛來福州的前期，在以描述福建民俗為主的《閩風雜記》裡，其實留有多篇作品可資查考。例如〈學堂十三趣〉有言：

67 中國晚清時期，因為面臨時代大變局，故展開了現代化的軍事教育，首先1885年在天津創辦北洋武備學堂，其後拓及各省，至於福建部分，由撫署改設而來的武備學堂係於1901年11月展開籌劃，乃閩浙總督許應騷所議設，道臺孫道仁擔任總理，到了1902年6月20日正式開校，參見〈改設學堂〉，《臺灣日日新報》，1901.11.26，3版和〈福州武備學堂の開放〉，《臺灣日日新報》，1902.6.28，2版。

68 關於警察教育，晚清係在1901年開始創立警務學堂，福建則於1906年6月創設，佐倉孫三旋即應聘擔任總教席（主任教官），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8.05，6版。

69 《臺灣日日新報》，1909.03.05，1版。

70 《臺灣日日新報》，1909.03.05，1版。

學堂係舊巡撫廳舍，門高壁厚，儼然如城郭，而其中廣闊，足容萬眾。殿堂廊廡，區畫井井，有望樓，有蓮池，有菊圃，傑木異草，蔥鬱而秀蒨，隱然占名園之觀。今充以為學堂，自教師學生，至閩人僮僕，無慮數百人，皆在此中，非有疾病事故，則不許出。余輩千里之客，亦結夢於此中，既無家眷團樂之樂，又無遠朋來訪之歡，暇則讀書，倦則逍遙庭中，其間所映眼觸情者，隨記以備異日之遺忘。⁷¹

由上可知，武備學堂係設在舊有的巡撫廳舍內，景觀甚美，平日佐倉孫三與其他學生們都居住其中，不能輕易外出。至於武備學堂的「十三趣」，包括：蕉林聽雨、老桑棲鵲、榕蔭養鹿、閣上明月、劍光槍影、藤蔭消暑、老荔罩烟、菊水相映、操場遊戲、燈光書聲、蓮池蛙聲、洋樓芳蘭、馬場知秋，這些便是令佐倉「映眼觸情」者。不過，雖有美景趣味在前，但是文中所謂「既無家眷團樂之樂，又無遠朋來訪之歡」，仍然道出心中寂寞。正因為在台灣不幸喪偶，故此番赴閩自是孤單，在《閩風雜記》的〈芭蕉記〉一文中，他又再次寫及：「余居學堂北隅，境清而幽，室之前後，有芭蕉數十株。……余輩客居終年，坐臥其間，既無家室團樂之樂，又無友朋談笑之歡」的感傷，足見寓閩心境，幸好還有數十株芭蕉「稍慰羈旅」。⁷²

而剛到福州的佐倉孫三，面對內心孤寂，除了以學堂觀景稍作療癒之外，有時則是透過旅遊名勝佳地排遣憂悶。他在《閩風雜記》〈遊環碧池館記〉中提到：「憶余少時，好讀唐宋諸家文，每欲一游以驗其文，今也偶客於茲土，時探勝槩，不亦善鄰之餘澤乎哉？」⁷³想起過去年少時，喜好閱讀唐宋諸家散文，每每想要遊覽中國土地驗證文中內容，現有機會到福建作客，因此不時踏查勝景。而此處尚有一耐人玩味處，亦即文末結尾將自己能夠「偶客茲土，時探勝槩」歸功於「善鄰」餘澤。究竟，「善鄰」所指為何？這其實與日本「亞細亞主義」有關。

71 〈學堂十三趣〉，《閩風雜記》，頁22。

72 〈芭蕉記〉，《閩風雜記》，頁30。

73 〈遊環碧池館記〉，《閩風雜記》，頁22。

佐倉孫三在《達山文稿》中曾經收錄早年作品〈送清國欽差大臣樸山何君歸國序〉，這篇寫於1881年的散文，是為了1877年首位中國駐日大使何如璋即將任滿歸國而寫。文中有言：

夫敝國之與貴國，所以不可不親厚者，不一而足矣！人同其種，是可最親厚也；文一其字，是可最親厚也；輔車唇齒之國，是可最親厚也。……蓋二國者，東洋之傑，而維持其權者，故一日無二國，則是無東洋也。今萬國列邦，雄視虎蹲，強弱相角，吞噬相爭，……故二國之策無他，在……同心協力，……斷絕西英之覬覦而已矣。……我邦有識之士有見于此，客歲成立興亞會，……使我子弟習清語，蓋其意在言語相通，二國親睦，而大興起亞細亞氣運也。⁷⁴

強調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之情誼，且有著唇亡齒寒的緊密關係，故必須通力合作對抗西洋，同時提到了「興亞會」訴求二國親睦，共同振興亞細亞氣運之說。有關「興亞會」，乃成立於1880年3月，倡議和贊助者有大久保利和、重野安繹、曾根俊虎、長岡護美、渡邊洪基、何如璋等人，此會係承繼1878年創辦的「振亞社」而來。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對中國情勢頗為關切，許多民間人士遂組織社團，研究中國問題，促進中日情感交流，疏通彼此意見，首先出現的就是「振亞社」，該社倡立人是大久保利通，創設目的在於交換兩國留學生，謀求雙方之善鄰和睦。⁷⁵對此，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認為「振亞社」和「興亞會」代表日本亞細亞主義的初始階段，相關主張是「亞細亞連帶論」，並標舉「日中提攜」和亞洲民族是命運共同體的想法；又，書中更進一步指出到了甲午戰爭之後，亞細亞主義便會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相關主張轉為「支那保全論」，表面上反對西方殖民者支解中國，實際則想一同瓜分共享利益。⁷⁶那麼，從1881年送別何如璋，到1903年來到福州的佐倉孫三，

74 〈送清國欽差大臣樸山何君歸國序〉，《達山文稿》，頁4-5。

75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04），頁1-2。

76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03），頁55-56。

其所謂「善鄰」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承上，佐倉孫三所指「善鄰」，其意有可能遠承「振亞社」、「興亞會」所重視的與中國之間的「善鄰和睦」、相互提攜之旨而來；但，因為佐倉孫三在其文中多次直接使用「善鄰」一詞，由於岡本監輔（1839-1904）在1898年倡設了「善鄰協會」，佐倉之師三島中洲也十分贊成此一組織，⁷⁷則如此亦有可能受此影響所致。何況關於善鄰協會，依據狹間直樹最新出版研究成果顯示，該會主旨強調日清韓鼎峙東方，利害相關，有如唇齒輔車，並認為三國要一心協和，彼此竭力扶持，尤其還存有將日本文明傳播到清、韓兩國的意圖，⁷⁸以上種種觀點在佐倉孫三各類著述之中時或可見，尤其在福州出版的《時務新論》更是如此，故其「善鄰」想法緣於「善鄰協會」的可能性極大。

而因為善鄰的餘澤，才有機會來到福州任教與旅遊的佐倉孫三，此行更大意義，若參照他1909年要離開全閩高等巡警學堂，全體學生所寫〈送佐倉先生歸國序〉：

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原稿誤作「逢」）則兼善天下，抱兼善之志，有不以窮達易者，其唯宏施教育者乎？吾師佐倉君東瀛名下士也，少孤，好學，從名師遊，精通經史，且喜擊劍，以視文學家萎靡不振之流，悉啻霄壤！壯年擢為警視郡長，尚鬱鬱不得志，蓋師固以為行己為己任也。光緒丙午閩省創興警學，仿邊因氏故事，聘師主講習，師於是勝任愉快，而兼善之目的已達。⁷⁹

可知佐倉孫三來閩任教，正能由「獨善其身」邁向「兼善天下」，因此頗感愉快。只是，兼善之志要怎樣實踐呢？由於《達山文稿》中收錄不少時人在1909年送別佐倉返國之詩文，故可以略窺究竟，同時也能掌握其人在閩第二階段的教學概況。例如，伍典從詩：「編述警章條井井，闡明學派誨諄諄」、吳德竣詩：「同文同種賞天然，化彼南閩孰比肩」，以及未署名之學生詩作：「文明

77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02），頁119。

78 同註77，頁121-122。

79 〈送佐倉先生歸國序〉，《達山文稿》，頁303。

進化輪同種，武術真傳紹六韜」，蓋從上課方式到以漢文「同文」教化南閩，或是將日本文明進化輸入福建，都成了佐倉孫三在閩重要表現；因此，福建士大夫甚至發出「設斯人不去，則楚材晉用，吾警學當可日新月異」的懇切慰留之意。⁸⁰簡言之，佐倉孫三有關警學的講授，在學生或時人眼中，應該已經發揮不錯的「善鄰」功效，成功達成了佐倉想要兼善天下之志。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可以達成善鄰目的或兼善天下的教育工作，有許多是透過「漢文」這個同文工具來執行。佐倉孫三對於「漢文」的功能有著深刻體會，他來福州教學之初，武備學堂學生吳雄呈曾經慨嘆：「學生未通日語，每見老師，往往相對無言，恨甚！倘語言能通，師弟之情當更深也。爰書數句，以當筆談。」⁸¹如此恰恰說明，正是多虧漢文書寫，才能明白師生雙方心意，亦可見「同文」之效。因此，佐倉在閩時期，於教學之外，最重要莫過於使用「漢文」來創作，並用以記敘、抒情、表志，以及設法改造閩人。他在此陸續完成了《閩風雜記》、《時務新論》二書與若干詩文作品，後者成果至少包括：〈遊環碧池館記〉、〈遊鼓山記〉、〈登烏石山記〉、〈遊玉尺山房記〉、〈白水園觀梅記〉、〈芭蕉記〉、〈遊閩江記〉、〈橋本少佐〉、〈前田中兄佐佩刀記〉、〈題大內大佐畫像〉、〈橋中佐〉、〈日本武士道論自序〉、〈日本武士道二十八篇〉、〈遊黃檗山記〉、〈上皋憲論警察改善書〉、〈新築警察學堂記〉、〈東仙竹內先生七十序〉等。⁸²這些詩文作品，有許多是因友人、學生之邀，參訪山川、名園所作，例如〈遊環碧池館記〉、〈遊鼓山記〉、〈登烏石山記〉、〈遊玉尺山房記〉、〈白水園觀梅記〉、〈遊閩江記〉、〈遊黃檗山記〉等；部分則屬於懷念故交同僚之作，如〈橋本少佐〉、〈前田中兄佐佩刀記〉、〈題大內大佐畫像〉、〈橋中佐〉等。其中，最具特殊論述意義者，則有《閩風雜記》、《時務新論》與〈日本武士道論自序〉、〈日本武士道二十八篇〉等。

以《閩風雜記》而言，這本發行於1904年初夏之作，相較在日出版的《臺

80 〈送佐倉先生歸國序〉，《達山文稿》，頁303。

81 〈遊環碧池館記〉，《閩風雜記》，頁22。

82 又，除以上漢文散文之外，尚有日文作品〈福州と日本〉及漢詩〈在福州偶成〉。

風雜記》僅晚一年，同時也是1903年秋天抵達福州，客閩不到一年的觀察心得。書中不僅止於福建民俗記錄而已，尚有他在閩旅遊、觀覽所得，此點已於前述。當然，《閩風雜記》更有佐倉孫三對於福建的優劣印象，而其中就有對閩地的評價與建言。例如：

〈二度收穀〉：「閩中之氣候，相同於台灣，一歲兩度收穀，可謂天賦之良土矣！……是以農人之勞，半於我邦，而收穫則倍之，且米粒之旨味，毫不減於我邦之產，福州知名蓋亦不空矣！」⁸³

〈無震無災〉：「閩地之得於天，厚於他鄉者，豈啻一歲兩收之利乎？人之最所忌且畏者，莫若於震災，而此地（原稿誤作「他」）近傍無火山，震動甚少，危樓傑閣之既就傾圮者猶依然；且年中無暴風，人民雖失火，不至延燒。我邦則反之，火山甚多，震害時起。」⁸⁴

雖然初來乍到，但佐倉孫三在《閩風雜記》中已經對於福建多所理解，且難得的是，以和日本、台灣相較的方式，寫出福建特殊之處。不過，書中對於福建自然氣候、風俗人情的諸多描述，固然是因為來此工作對閩地感到好奇，希望有所認知而加以考察，但真正撰寫背景與目的，〈閩風雜記序〉自陳：

余曾宦臺灣，公餘摘記其風土習俗之相異者百餘，名曰《臺風雜記》，以付剞劂。昨夏游閩，以前所觀，比今所見，則概相同。唯彼地近時人文稍開，此土則仍漢唐相沿之舊，風尚稍異，乃記以續之。雖不無蛇足之訛，然微意所存，苟有補於同文勸勉之一端，則何幸如之！⁸⁵

因為在台灣創作了《臺風雜記》，如今既有遊閩機會，自然也會想對當地風土進行考察，他認為台灣在被日本統治之後「人文稍開」，閩地則仍然延續「漢唐之舊」，為了能夠發揮「同文勸勉」之效，於是繼《臺風雜記》，再度執筆

83 《閩風雜記》，頁16。

84 《閩風雜記》，頁16。

85 《閩風雜記》，頁1。

寫就《閩風雜記》。至於完成後的內容能否達到「同文勸勉」目標？在本文前面曾經援引爵南生所寫序文，他稱讚此書對於閩地山川奇狀、閩巷俚談都刻意描摹，引人入勝，尤其有關山川險易、風俗澆淳的書寫，其實更可一卜一國盛衰文野，知曉人民意思，讀者亦可憑此一探治化之源。再者，也透過此書所載，而更加闡明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制度文物相似現象，故提出可在此書基礎上，進一步促成彼此的講信修睦、守望相助。對此，其實佐倉達山在日後成書的《達山文稿》自序中，也再次表達自己當年在福建任教時的著書立說，乃是深刻體認到中、日之間「唇齒輔車」之急。

只是，《閩風雜記》到底怎樣傳達出同文勸勉、善鄰與唇齒輔車之念呢？此書共計羅列福建風俗筆記77條目，其中有38條與《臺風雜記》相對應，⁸⁶如果兩相參看，便能掌握佐倉孫三相互連結、卻又形成比較視野的思考用意，故得以在台灣、日本與中國福建的參照之中，看出彼此可以觀摩、變革之處。除此之外，他更在下列數條記載之中，進一步闡述自己對於福建的意見與建議：

〈魚市般販〉：閩地魚市場章程之設，其最急矣。⁸⁷

〈右避左行〉：我邦近來設通行迴避之法，警吏銳意任之。⁸⁸

〈糞桶縱橫〉：道路章程之急於是乎起矣。⁸⁹

〈溺水狼藉〉：清人視污溺如水，……汜濫狼藉，怪臭撲鼻……，聞近有設警務學堂之議，學堂而既成，是等之事宜其第一致思者矣。⁹⁰

〈不藏刀劍〉：「清人藏文具而不藏武器……孔聖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之與武豈可偏廢哉！」吳懋昭拜讀：「陋俗荷高文點染，讀竟自笑，善鄰之勸，尤佩厚誼。」⁹¹

透過上述，可以看到佐倉孫三對於福建當地治理強烈不滿，字裡行間多次標榜

86 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漢學研究》28卷4期，頁275。

87 《閩風雜記》，頁13。

88 《閩風雜記》，頁14。

89 《閩風雜記》，頁14。

90 《閩風雜記》，頁14。

91 《閩風雜記》，頁20。

應「急」處理或須列為「第一」要務，頗見心切。且為了徹底改善，他提議趕緊修訂相關法律章程，並認為武備與警務十分重要，希望清人能夠有所體認。而當佐倉一一提出革弊之道後，時人吳懋昭大力讚譽佐倉批評閩地陋俗的措施，確有「善鄰勸勉」之用，而此與前引爵南生序文持論相彷彿，顯見佐倉自己設定此書要能「有補同文勸勉」，實際上時人已有同感。

接續1904年《閩風雜記》之後，就是1905年《時務新論》的出版。觀察1903年《臺風雜記》到後續的二書，吾人可以明瞭佐倉孫三對於風俗的觀察紀錄，其實具有政治目的，他顯然認為民俗與政治息息相關；所以，才有從「民俗」到「時務」（じむ）的構思，以為在掌握民俗之後，更該認知現代時局情勢。關於《時務新論》這本書，相較前面二本民俗記錄之書發議更多，且在論說立場上，乃從日清／日俄／西洋與東洋關係，去談論日本經驗，以及清國往後應當效法的方向。至於書中內容，則是從教育、民俗改革、警務、精神教育、消防救災、墓地制限、監獄制度、獎勵刀劍、政令、衛生、刑律、科舉、學制、兵制等面向進行論說，全書以「或問」的方式，引導出有關日本、清國、台灣與東亞之事。

因為此書充分彰顯了漢文議論的功能，以及東亞問題之意義性，故其中的探問，饒富當代性的政治意義，如在〈論清國風俗〉以為欲挽回清國今日頹勢，宜一以文教涵養民心，一以政令改革民俗。⁹²〈論警察制度〉指出清國之取輕侮於外人，道路雜遝污穢為最大原因，要矯正此陋習，莫急於設警察制度，莫若仿效日本現行法。⁹³至於〈論日本進化主義〉則為中華畫策，以為當先盛軍備、堅固門牆，而後設警制、整頓內庭，改教育制度而薰陶子女，興醫術而健其身體。⁹⁴〈論精神教育〉談到日本精神教育係以神儒佛三道為基礎，日俄戰爭能贏是因為「養和膽，利用洋器」，中國應該要再興昔時文教，模倣日本尚武精神，即「中文日武」精神即成。⁹⁵另，於〈論東亞之形勢〉中，說明日本對韓國、台灣、福州之看法，並強調日本所操主義本領，一切皆以

92 〈論清國風俗〉，《時務新論》，頁9。

93 〈論警察制度〉，《時務新論》，頁10。

94 〈論日本進化主義〉，《時務新論》，頁14。

95 〈論精神教育〉，《時務新論》，頁17。

「東亞興廢」為最重要考量，是以會去取台灣係因「臺灣者，東南之南關」，南關如果不嚴鎖，將無法抵禦西寇。⁹⁶再如〈論臺灣政治〉，剖析日本取得台灣之後，除三害（建病院減疫癘、設警署滅匪害、設撫墾署綏撫原住民）、興三利（訓育童蒙、興交通、獎勵農工林礦）。⁹⁷〈論街路言語逆旅貨幣交通之改善〉以為中國最不便、不快者有五：街路不潔、交通不便、言語雜駁、逆旅不備、貨幣混亂，而日本則全然沒有這些缺點。⁹⁸此外〈論日清兩國交通沿革〉，此論二國的外交、遣使互動，敘述歷來狀況，最後提及日清戰爭，清國當以「不計仇主義為國是」。⁹⁹而〈論尚武主義〉一篇，則是認為中國與日本同洲、同種、同文而大異其趣者，日本富尚武之氣象，而中國乏此氣象，故建議中國應該設演武場，並提到近日台北已有日人所設演武場，土人來學者甚多。¹⁰⁰最後，本書得出〈結論〉，以為中國當如日本之模仿泰西／西學，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國蟬脫舊套、遷移新運」，但免不了會發生新舊主義之衝突，甚至以為頑固主義者實際不在人民而在當路；那麼，要如何鼓吹「進化主義」，是否有順序之別？佐倉認為重點要先改變施政方針，而其中警察制度當為先驅，這自是與其個人專業、任職經驗密切攸關。¹⁰¹

另外，有關〈日本武士道二十八篇〉，乃其系統性探究日本武士道之作，文中論及武士道之發端、淵源、意義、品位、東西武士道之異、武士道養成法、武士道與刀劍關係、武士道與復仇關係等，而之所以專就武士道進行論說，依照〈日本武士道論自序〉來看，是想藉由分析日俄戰爭日本獲勝原因，即因日本士民忠勇，擁護天皇的武士道所致，去「移植諸同文國，而酬千有餘年善鄰之誼而已」，¹⁰²就此提供中國向日本學習之方向。

綜上，無論是《閩風雜記》、《時務新論》或是〈日本武士道二十八篇〉，這些書寫或出版於福州的作品，雖然觀察與體會是以福州為藍本，但

96 〈論東亞之形勢〉，《時務新論》，頁24。

97 〈論臺灣政治〉，《時務新論》，頁25。

98 〈論街路言語逆旅貨幣交通之改善〉，《時務新論》，27。

99 〈論日清兩國交通沿革〉，《時務新論》，頁34-36。

100 〈論尚武主義〉，《時務新論》，頁36-37。

101 〈結論〉，《時務新論》，頁41。

102 〈日本武士道論自序〉，《達山文稿》，頁266-267。

背後所想往往是整個「支那」的問題，因此充滿佐倉孫三關注「同文」清國的「善鄰」用意，以及努力輸入日本文明的鼓吹言說。由於佐倉的福州之行，福建早已歸入日本控管，故即使閩地不同於台灣的殖民地性質，但日本勢力也正在拓展中，故從1903年到1909年，此段期間佐倉孫三對於福州風俗與治安考察甚勤，最終更藉由《閩風雜記》、《時務新論》與〈日本武士道二十八篇〉等，提出自己的觀察與建議，乃至抨擊與批判，尤其強力倡導警察制度與武士道精神。如此一來，佐倉孫三的帝國漢文，將不僅是要與福州人民相親近的媒介，更是強力指導改善福州區域政治、導向文明的藥方與產生干涉作用的毒藥，其實具有雙面刃的作用。至於其所言，在「善鄰」、「勸勉」之餘，更有著與日本南進論、總督府對岸經營論述相聯繫之處，¹⁰³故不能不加留心。

四、結語

做為一位畢生積極從事漢文書寫者，同時也是致力關心世道的「有心人」，由於佐倉孫三曾經分別在台、日、中不同地區擔任多種角色，並留下數量可觀的漢文創作，包括《臺風雜記》、《閩風雜記》、《達山文稿》、《時務新論》、《談藪》等專著，以及若干散見於報刊之作，因此本文便藉由其人的漢文跨界移動書寫，去探索這位來自日本帝國的漢文人，對於有著「同文」現象的台灣與福建而言，其漢文創作究竟意味著什麼？與兩地關係如何？而兩個「南方」在其觀察下，又具有怎樣的特殊空間特質？如何發揮日本南進路徑上的節點角色？

透過前面內容的剖析，筆者除了說明佐倉孫三的漢文書寫，形塑、再現台、閩兩地不同空間面貌之外，也闡述了兩個「南方」對於佐倉生命史、精神史的意義，同時指出其人無論是對台灣風俗的考察，理蕃大業的建言，或是福州空間的治理規劃，東亞情勢的分析，乃至尚武精神的掄揚，以及對中國的種種議論，都直指日本帝國漢文，原本做為一種文字現象，最終卻成為一種文化思想的規範與強制力道，甚而有益於為日人統治和掌控奠基。是故，在台、

103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03）。

日、中同文交錯的歷程中，來自帝國的漢文，於從事溝通、交流、唱酬之餘，其實更曾發揮殖民、統治、善鄰、南進的工具性與資源性價值，由是而彰顯了「同文」在近代東亞區域的政治力學作用，以及東亞漢文／漢文學相互之間的矛盾糾葛樣態。

至此，隨著參與殖民地統治的日本漢文人的跨界移動，以及透過與被殖民者的接觸，將會發現在促成東亞漢文／漢文學交錯對話的當下，「漢文」本身實際已經成為一個思想交界場域。就在帝國政治的牽動下，民族、民俗、文化、歷史、文學互相流動與影響，甚或刺激、箝制。於是，在鑽研日治時代台灣漢文學的同時，顯然不能不注意那一條由日本在台漢文人，所牽引、綿亙的東亞漢文延長線、交叉線。

附錄：佐倉孫三生平年表

西曆	紀年/年齡	生平事蹟（含創作繫年）
1861	文久元年 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月18日，出生於岩城二本松（今福島縣二本松市），屬二本松藩，藩主為丹羽長國（1834-1904，藩主任期為1858-1868）。 父佐倉政行，時年36。母平島氏。 祖父佐倉政忠，時年60。 兄佐倉強哉（1850-1939），時年11。 姐佐倉貞，後適陸軍軍醫正林德門。
1864	元治元年 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0月9日（舊9月9日），父親佐倉政行參與討伐天狗黨之亂，進守常陽太田村（今茨城縣太田市），伏兵竹河原狙擊叛賊，奮戰中被殺。卒年39歲。
1865	慶應元年 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幼時，與群兒角力，常占優勝，人呼曰達山（取其鄉安達太郎山稱之），後便以此為號。（《達山文稿》，按文稿未寫具體年歲，此繫年乃筆者推測判斷）
1868	慶應4年 明治元年 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月29日，祖父佐倉政忠（真學、似水）於戊辰戰爭時殉難，卒年67；佐倉達三回憶自述為8歲之事。
1877	明治10年 1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月，西南戰爭爆發。兄長佐倉強哉參與警視廳拔刀隊出征，10月動亂平定後奉職於警視廳警部補。 12月，上東京。

1878	明治11年 1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月，以走讀生身分進入二松學舍就讀。 11月，錄取為二松學舍住讀生。
1880	明治13年 2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自題寫真像後〉一文，感懷寄世二十載，書以為戒。 春，撰〈題深夜讀書圖〉一文以自勵。 7月11日（舊6月5日）與同學安藤子毅等八人寫真合影，另撰有〈書寫真圖背〉一文以自勉。 9月19日（舊8月15日），與友人至洲崎觀月，後撰〈中秋觀月記〉一文。10月3日夜，大風歛起。撰〈風喻〉一文，感懷執政者專權，故今有設國會之議。
1881	明治14年 2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月，撰〈送清國欽差大臣樸山何君歸國序〉，表達日清應當親善之意。 8月（舊7月），利用業暇之時返歸小田原寓所探望母親。 8月10日（舊7月16日）與小川子平遊石橋山，有〈遊石橋山記〉一文。
1883	明治16年 2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上中洲先生書〉，表達入學五年來個人之感懷及希冀秉承父祖輩遺志，報效國家。 10月，擔任二松學舍塾頭和幹事。 撰〈再上中洲先生書〉，感念其知遇之恩，委以塾長和幹事之職，並表達個人必當竭力以赴。
1886	明治19年 2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任職千葉縣警部補前，曾應試陸軍士官學校，因不善算術而落榜。唯，所撰〈武田信玄論〉為校長谷中將所稱揚。 10月，任職千葉縣警部補。
1886	明治20年 2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讀德川氏正記〉一文，感慨德川政權之亡，當為今日借鏡。
1887	明治21年 2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兄佐倉強哉判檢事登用試驗及格，後歷任各地方裁判所檢事正。
1888	明治21年 2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巡查山口久司君殉難碑〉。 7月，《霞城の太刀風：二本松老少年隊の勇戰》（和文）由二本松的相原秀郎出版。
1890	明治23年 3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月，任職千葉縣佐倉警察署次席警部。 3月，與友人續綠海同遊佐倉「所憩園」賞梅。撰有〈所憩園觀梅記〉，詠梅之外，更感懷藩主堀田文明之開明，及其對後世之影響。 撰〈巡查鈴木清助遭難碑〉一文。
1891	明治24年 3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8月，任職警視廳警部。 發表〈讀老子〉一文於《東海北斗》42號（明治24年11月10日）。此文復刊於《漢文時報》27號（1911.09）。 12月3日，《警士之龜鑑》（和、漢文）由東京知新堂出版。

1892	明治25年 32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表〈雪佛傳〉一文於《東海北斗》47號（明治25年1月25日）。 7月14日，《日本尚武論》（和、漢文）由東京教育社出版。依版權頁載當時居住在東京市牛込区揚場町14番地。
1893	明治26年 3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山岡鐵舟傳》由普及社出版。
1894	明治27年 3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月2日，《國之盤根——安部井翁之傳》（和文）由東京博文堂出版。
1895	明治28年 3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月，隨樺山資紀搭橫濱丸來台，初任職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員。 8月，三島中洲〈寄懷在台灣佐倉達山〉。
1896	明治29年 3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9月12日，時任民政局內務部警保課高等警察掛長的佐倉孫三（四級俸、勳七），與三上警部出差前往石碇街地方討伐隊營地。9月14日，再與二名台北警察署警部及多名巡查，由石碇街前往坪林尾支援島田少佐部隊。9月14日，隨同島田隊長返歸台北。 11月下旬，出差前往深坑街視察「土匪」歸順情況。11月28日，返歸總督府上班。 12月5日，初以「稱史」之名發表《臺風雜記》於《臺灣新報》。12月6日至11日，以「達山髯史」之筆名，繼續於《臺灣新報》發表《臺風雜記》各篇。 12月中旬後，赴宜蘭。
1897	明治30年 3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月18日，大屯山下雪，因撰〈望雪記〉一文發表於《臺灣新報》，述其來台第一次觀雪之感懷。 總督府準備派員探檢紅頭嶼，佐倉孫三撰〈送總督府員赴於紅頭嶼序〉為友人佐野君、成田君、藤本君、稻田君等送行。 2月26日起改以「佐倉達山」（或用「達山居士」）之正式名號持續發表《臺風雜記》各篇，至3月28日。 3月，上京。 約6月，佐倉夫人セヨ子去世，年31。6月17日於北門外本願寺舉行葬送式。 6月30日，服喪期滿，返歸總督府復職。 8月21日，民政局文武官僚設壇於淡水館祭祀年初被殺之深岨大尉、原林學士等。佐倉孫三起草〈祭深岨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一文。 10月10日，撰〈題獨眼將軍影像〉一文，發表於《臺灣新報》第327號（1897.10.10，1版）。此文追悼甲午戰役中攻陷旅順並下令屠城的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1841-1897，土佐藩土山路元恒之子）中將。 10月16日，撰〈示囊駝師書〉一文，發表於《臺灣新報》第332號（1897.10.16，1版）。 12月，參加玉山吟社江瀕亭餞年雅集。因不擅詩，故撰〈江瀕亭玉山吟社丁酉餞年雅集序〉以應。

1898	明治31年 3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月18日，派任鳳山縣警視，勳七等，五級俸。 2月1日，參與芝山巖殉難六君三週年祭，並撰祭文。 2月5日，赴任鳳山縣警視。 2月9日，任命為打狗警察署長。 4月30日，奉核晉級為勳七等、叙正八位。 6月20日，升任台南縣辦務署長，並改敘高等官八等、六級俸。
1899	明治32年 3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月13日，調任回日本內地擔任靜岡縣警部。 4月9日，任靜岡縣警察署長兼巡查教習所長。
1900	明治33年 4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約於今年5月，任山梨縣北都留郡長，授從七位勳六等。
1901	明治34年 4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2月16日，由山梨縣北都留郡長休職。
1902	明治35年 42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月，清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訪問日本，抵東京，應二松學舍邀宴，歡迎會上佐倉撰〈歡迎會序——北京大學堂總教習吳君摯甫來朝〉一文相贈。 服部宇之吉應邀赴清國大學堂任職，先生撰〈送服部文學博士赴任清國序〉一文為其送行。 10月14日，與野村素軒遊東京近郊之玄武山普濟寺。有〈普濟寺觀月記〉一文。 為好友岡村氏（大村藩，今常崎大村市人，號晚翠）撰〈晚翠廬記〉一文。
1903	明治36年 4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賃居東京礪川久堅之里（今小石川區大塚）。 為鄰居稗田三平氏宅「輟耕廬」作記，有《輟耕廬記》一文。 2月，後藤新平為《臺風雜記》作序，矯堂橋本作跋。 8月，《臺風雜記》由東京國光社出版。 8月，應聘擔任清國福建省武備學堂教習。 臘月初六日，與同僚遊福州環碧池館（今西湖賓館），撰〈遊環碧池館記〉一文。 臘月28日，與邊見、巖切二君（同肄業於二松學舍）遊鼓山，撰〈遊鼓山記〉一文。
1904	明治37年 4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月，《橫綱常陸山》自印出版。 1月10日，與學生登福州城內烏石山，後撰〈登烏石山記〉。 應武備學堂學生郭學遠（郭柏蒼之後人）之邀，參訪其家園林「玉尺山房」（按光緒七年，郭柏蒼入住玉尺山，在光祿吟台內潛心營造，有「漾月池」、「柳湄小榭」、「蕉雨室」、「偃月寮」、「沁泉山館」等景觀。宣統初年，郭家業敗，光祿吟台被官府沒收），撰有〈遊玉尺山房記〉一文。 撰〈白水園觀梅記〉一文。按白水園為劉氏別墅，佐倉友人橋本某甫福州寓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撰〈芭蕉記〉一文。佐倉寓居學堂北隅，室之前後有芭蕉數十株，為僚友瀧澤君兩年前所植。 · 4月10日，與瀧澤、巖切二君遊閩江，有〈遊閩江記〉一文。 · 5月，爵南生為《閩風雜記》作序。 · 《閩風雜記》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撰〈橋本少佐〉一文，記其事蹟。按橋本齊次郎，任武備學堂總教習，本年7月因病逝。 · 撰〈論日俄開戰〉、〈論日俄戰爭影響〉、〈論日俄戰爭之狀態〉、〈論旅順戰鬥〉、〈論東亞之形勢〉、〈論臺灣政治〉等文，討論日俄戰爭以來相關局勢，後收入《時務新論》一書。
1905	明治38年 4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月，《時務新論》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撰〈前田中佐佩刀記〉一文。此刀為前田彪亡兄於日俄戰爭遼陽戰役中使用之佩刀，其兄卒於1904年9月5日。 · 撰〈題大內大佐畫像〉一文。按大內大佐死於1904年8月21日日俄戰爭第一次旅順總攻擊戰役中。 · 撰〈橋中佐〉一文。按橋周太中佐死於1904年8月31日日俄戰爭之遼陽戰役中。 · 4月，撰〈日本武士道論〉13篇（含自序），後收入《達山文稿》。
1906	明治39年 4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月，應聘擔任福州「警務學堂」總教習（主任教官）。 · 8月，發表「或問一章」，刊於《臺灣教育會雜誌》53期（1906.08.25）。 · 11月3日，參與福州日本領事館舉辦之天長節祝典。
1907	明治40年 4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8月17日，與律師相澤君、通譯邱生遊黃檗山，後撰〈遊黃檗山記〉一文。 · 《遊黃檗山記》自印小冊出版。 · 撰〈上皋憲論警察改善書〉一文。
1908	明治41年 4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月，福州高等巡警學堂校舍新建落成，撰〈新築警察學堂記〉。 · 1月7、8、10日，〈遊黃檗山記〉一文，連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 為其師竹內氏（號東仙。二本松藩文士，先生幼時曾授業門下）撰〈東仙竹內先生七十序〉。（撰稿時間據文意推測）
1909	明治42年 4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月19、20、21、23、24日，〈福州と日本〉一文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從文學、宗教、殖產三方面探討福州與日本的關係，並將〈遊黃檗山記〉翻譯為和文。 · 撰〈在福州偶成〉一詩。 · 4月（春三月）左右，離開福州，返歸日本。全閩高等巡警學堂學生有〈送佐倉先生歸國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月9日，三屋清陰發表〈送佐倉達三君東歸〉一詩，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332號（1909.06.09，1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同日第3332號）。 • 與二松學舍同學尾立維孝等計12人，相約設筵於四谷三河樓敘舊。其後撰〈皆夢會記〉，並投稿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402號（1909.08.31，1版）。
1910	明治43年 5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再次抵台任職。 • 4月26日，任職蕃務本署囑託。 • 5月25-30日，調查桃園、台北兩廳隘勇線，由桃園大料嵌一路北上，至新店屈尺，返歸台北。撰〈登插天山記〉一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520號（1913.01.01，六一版，收入《達山文稿》，頁227）；又刊於《蕃界》3號（1913.05.15），頁153-156，「詞藻」。此行因夜宿廳長西美波所築館舍，有感而發，取《詩經·大雅》「南風之薰」，為題「薰風」二字以為館名，有〈薰風館記〉一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830號（1911.01.19，1版）；又刊於《蕃界》3號（1913.05.15），頁153-154。 • 6月17日，日本領台十五週年始政日，佐倉孫三撰〈十五年前の夢〉，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回憶15年前由日本出發來台接收，一直至6月17日始政式前之種種。 • 代撰〈警部飛田君碑〉一文。 • 撰〈送安江五溪游清國序〉，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720號（1910.09.17，1版）。 • 11月3日，有〈題那須宗高射圖〉發表於《台灣》創刊號。 • 11月6日，山本竟山（總督府囑託，書法家）發起成立「羅漢會」，以每月第一休日聚會。 • 12月4日，參與第二回羅漢會例會，有〈羅漢會記〉一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788號（1910.12.06，1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795號（1910.12.13，1版）。 • 12月16日，為理蕃本署同僚豬口安喜（鳳庵）南門外居所撰〈鳳庵記〉，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798號（1910.12.16，3版）、《臺灣日日新報》第3802號（1910.12.20，1版）。 • 兄佐倉強哉以大審院檢事辭職，返回福島市自行開業任弁護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歲逢辛亥，生肖為山豬，故撰〈山豬說〉一文以抒所感，文中以山豬喻台島生蕃，並言理蕃者當能變其習性。 • 1月8日上午十時，蒞南門外豬口鳳庵氏宅參與第三回羅漢會，與會者另有西蘭山、須賀蓬城、河原栢年、堤錦江、川田墨鳳、水谷虛堂（奧嶺）、伊阪胡山（誤作井坂）、大久保石壽（誤作石濤）、松田寄山、藤岡豐秋、田能村小竹等書畫家十餘名。 • 撰〈題寒月照梅花圖〉一文，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832號（1911.01.22，1版）。 • 為木下大東書畫帖作序，撰〈大東書畫帖序〉一文，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836號（1911.01.25，1版）。

1911	明治44年 5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撰〈遭難六士の追懷〉一文，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843號（1911.02.02，1版）。 • 帝國生命保險會社即將於台設立，佐倉氏撰〈觀新築保險會社記〉，（《臺灣日日新報》第3883號，1911.03.15，1版），盛讚保險乃文明之產業，然欲保人之生命財產，必先保自己之名譽，亦必先護我社會之堅實。 • 4月，撰〈書沈南蘋畫幅後〉一文。（按文中紀年為辛亥，故繫此，唯所述背景新橋酒樓似應在東京，待考） • 4月9日，參加羅漢會例會，於府中街渡氏家召開，與會者有：竟山、達山、蘭山、寄山、溫岳、洞崑、雅章、栢年、永讓、湖山、小竹等十數名，此次有自南清渡來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原田謹次郎現場揮毫。 • 4月11日至25日，視察霧社，回程順遊日月潭。撰有〈霧社紀行〉一文。（《蕃界》1號，1913.01.15，頁115-119，「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615-4619號，1913.04.11-15，六版）。 • 於《臺灣日日新報》第3795號（1911.06.17（六））刊出〈十六年前の夢〉。 • 7月，獲清國宣統皇帝頒授三等第一雙龍寶星章。 • 7月8日下午，佐倉達山、伊藤壺溪、上山江村等首倡發起，邀會前渡南清之人，於古亭庄清涼亭舉行南清懇話會。 • 撰〈送畫伯新井洞巖遊宜蘭序〉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011號（1911.07.24日，1版），此文主為畫家新井洞巖（今春來台）赴宜蘭贈行。 • 7月30日，《臺灣日日新報》發行4000號，佐倉孫三為撰〈祝辭〉（7版）。 • 日本駐福州領事高洲太助新築一屋於公署亭中，名曰「聽月樓」，佐倉孫三為撰〈聽月樓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017號（1911.07.30，3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025號（1911.08.07，1版）。 • 山本竟山移居臺北府前街，有樓與七星山相對，乃自題曰「對星山房」，佐倉孫三為撰〈對星山房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8月11日第4029號三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029號（1911.08.11，3版1版）。 • 撰〈詠沂園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103號（1911.10.27，3版）。 • 11月，撰〈所憩園觀梅記〉刊於《臺灣時報》。 • 11月5日，畫家堤錦江（任職警察官）將歸內地，友人於北門街烏松樓為其舉辦送別雅會，與會者在北書畫家伊阪胡山、大久保石壽、川田墨鳳、狩野永讓、加藤墨陽、高橋滹山、堤錦江、山本竟山、新井洞巖、古屋中隱，佐倉達三、水谷虛堂、須賀蓬城等十餘名。 • 撰〈香雪庵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138號（1911.12.04，3版）。 • 12月5日，赴福州。
------	--------------	-----------------------------------------------------------------------------------------------------------------------------------------------------------------------------------------------------------------------------------------------------------------------------------------------------------------------------------------------------------------------------------------------------------------------------------------------------------------------------------------------------------------------------------------------------------------------------------------------------------------------------------------------------------------------------------------------------------------------------------------------------------------------------------------------------------------------------------------------------------------------------------------------------------------------------------------------------------------------------------------------------------------------------------------------------------------------------------------------------------------------------------------------------------------------------------------------------------------------------------------------------------------------------------------------------------------------------------------------------------

1912	明治45年 大正元年 52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月8日，由南清歸台。 • 撰〈石坂文庫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191號（1912.01.28，3版）。 • 發表〈遭難六士を追懷す〉，刊於《臺灣教育》118期（1912.02.01） • 以「社外」身分參與瀛社詩壇活動，撰〈讀吳鳳傳〉一文，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208號（1912.02.16，3版）。 • 撰〈題藤園將軍照像背面〉一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214號（1912.02.22，4版），又收入《兒玉藤園將軍》（兒玉源太郎大將十三回忌紀念出版物。拓殖新報社、大正7年8月25日刊）。 • 2月，〈輟耕廬記〉刊於《臺灣時報》。 • 3月，〈遊玉尺山房記〉刊於《臺灣時報》。 • 為友人高橋由義之父高橋秀一（1821-1863）撰〈南山高橋君碑〉。 • 為台南法院通譯星橋澤谷書房「水竹書樓」撰記。 • 6月17日，發表〈領臺後に於ける五大變化〉（日文）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328號（1912.06.17，3版），分從交通機關、市街道路、衛生設備、保安制度、教育機關五方面，歷數日人統治後之大變化。 • 為南投廳警務課長倉用貞撰〈警視長倉君碑〉（《臺灣日日新報》第4392號，1912.08.21，6版、《蕃界》3號（1913.05.15），頁161-163，「彙報」）。 • 為篆刻家西樵石氏撰〈樵石印譜序〉，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389號（1912.08.18，6版）。 • 總督府中學校教諭黃葉秋造辭官將歸東京，佐倉孫三撰〈書秋村送別詩文集後〉為其送行。 • 為黑田至朗（1841-1906）撰〈冰川黑田君碑銘〉，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464號（1912.11.05，3版）。 • 撰〈紀漆崎大尉從卒市川為市事〉一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477號（1912.11.18，3版）、《漢文時報》39號（1912.12），記述漆崎大尉侍從兵市川為市事蹟。
1913	大正2年 5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月15日，發表〈蕃婦タララの譚〉於《蕃界》1號，頁87-89。 • 3月15日，發表〈蕃酋潘文杰の譯〉、〈內地觀光蕃の感想（上）〉、〈論北蕃之氣質〉於《蕃界》2號，頁89-92、98-104、113-115。 • 7月，遊台南，投宿上田氏。至西竹里訪朽木義春（研堂），觀賞其所收藏之古研，後撰〈研堂記〉一文。 • 返歸日本，移居東京礪川（小石川區大塚窪町24番地）。 • 擔任早稻田實業學校講師，另講學於獨逸協會學校。 • 撰〈先考信行府君行述〉，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772號（1913.09.18，6版）。 • 撰〈祭先考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773號（1913.09.19，6版）。 • 10月10日，父佐倉政行五十週年祭辰，常陽太田町有志者為其建碑並舉行追悼法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送野口山田兩君序〉，與同人在望岳樓為野口多內（1876-1949）、山田謙吉（186?-1937。福島人）送行。（此繫年乃據山田謙吉任職東亞同文書院推測。）
1914	大正3年 5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0月21至23日，參與早稻田實業學校學生修業旅行，遊日光山。後撰〈鹽溪晃山紀勝〉一文。 撰〈忘筌堂記〉。按忘筌堂，乃鄰居鷹田其石君（1871-1946。畫家，下新川郡生地町人，幼名龜之助，鷹田彦右衛門長男。1889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從橋本、狩野諸氏學北畫）之堂室名。 11月，撰〈攘白堂記〉，記小此木信六郎（二本松藩蘭醫小此木元智之孫，1896年6月由德國留學歸國，於神田區開設耳鼻喉科診所）構于礪川之別墅。文末附記曰：「拙稿之成也，會歐洲大亂，餘焰延及我東洋，而青島忽破，今不復見獨氛，亦攘白之一兆歟？噫！」
1915	大正4年 5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虛谷前島君碑〉一文。按前島君，即前田彪（1866-1915），1898年於福州創設《閩報》。 10月14至16日，參與早稻田實業學校學生修業旅行，帶領第二班學生遊函嶺。撰〈函嶺湯磧紀勝〉一文。 11月10日，撰〈植樹記〉一文，記大正天皇即位之典，早稻田實業學校師生於講武堂旁植樹以為紀念。
1916	大正5年 5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擔任二松學舍講師。 撰〈梅叟安部井翁碑〉一文。按安部井翁氏（1832-1916），二本松藩士安部右之丞長子，大正5年11月19日病歿。
1917	大正6年 5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1月23日，與河野新井諸子遊天覽山（今埼玉縣西南）。有〈遊天覽山記〉一文。
1918	大正7年 5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月，赴其師三島中洲邀宴，蒞其寓所荏原郡大井街（今東京都品川區大井町）鴻塚里「繪原村莊」，受邀者另有岡田葆卿等九人，皆及門弟子。有〈繪原村莊會宴記〉一文。
1919	大正8年 5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擔任二松學舍教授。 撰〈青淵澁澤男〔爵〕八十壽序〉一文。 撰〈祭三島中洲先生文〉。
1920	大正9年 6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擔任二松學舍夏期講席會午前科講師。
1921	大正10年 6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0月9日，華甲壽祝賀會（并兒島文學博士授與祝賀會）。
1923	大正12年 6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松學舍出版部發行〈二松學舍講義錄〉，部長尾立維孝、部員佐倉孫三。 撰〈飯富村荒地復舊紀功碑〉一文。按土橋元三郎整頓富士川（山梨縣南巨摩郡飯富村一帶）沿岸，得良田無數，地方人士建碑以記其功。

1924	大正13年 6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男爵大倉翁八十八壽序〉一文，為大倉喜八郎祝壽。按大倉喜八郎（1837.10.23-1928.4.22），號鶴彥。出生於越後新發田（今新潟縣），為日本著名實業家。 11月15日，應晚晴福島氏（1859-？，越後長岡人。本姓鬼頭，其父鬼頭平四郎為長岡藩藩士）之邀，參與雅文會之觀楓宴。與會者另有：子爵建庵、勺水、遠湖、朴堂、犀東、天隨、東陵、指月等八人。撰有〈招隱舍雅集記〉一文。 11月23日，有志者邀野村素軒於東京王子園開翰墨會。佐倉撰〈王子園觀楓記〉一文。
1926	大正15年 昭和元年 6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武士かたぎ》，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牛込區（今屬新宿區牛込神樂坂）若宮八幡升格為郷社（大正14年8月事），為撰〈若宮八幡昇格碑〉一文。
1927	昭和2年 6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青淵澁澤先生八十八壽序〉一文。又代撰〈子爵澁澤先生米壽序〉一文。 撰〈香村詩集序〉一文。按香村姓上條，乃山梨縣北都留郡上野原町島田村人。 撰〈晚晴福島君七十壽序〉一文。 夏期講習會，擔任講師。 7月30日，歸省福島。其兄置酒謳謠曲以待，乃佐藤寡婦迎勞之曲，因有感傷。翌日，往西北郊大鳥城址弔佐藤兄弟（佐藤繼信、佐藤忠信，平安時代末期武將，1185、1186年相繼逝世）墓。後撰〈調佐藤（誤作藏）兄弟墓記〉一文，以歌詠其事蹟。 8月9日，與加藤氏（號芳雲）遊山梨縣北都留郡上野原町島田村（今山梨縣上野原市上野原島田），夜宿鶴洲樓。撰有〈鶴洲樓記〉一文，記遊外，并記橫溝治郎氏。 撰〈祝辭〉一文。祝賀瑞光小學校長山口君參列昭和天皇就職大典。
1928	昭和3年 6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月，擔任「二松學舍專門學校」漢文教授。 編纂《模範漢文新選》，東京松雲堂書店出版，有〈模範漢文新選自序〉。 9月15日，《霞城の太刀風：二本松老少年隊の勇戰》，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1929	昭和4年 69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壯烈美譚鈴木巡查》，由日東之華社出版。 撰〈書護身觀世音像背〉一文。按忍岡高等女學校校員，因感念晚晴福島君之長期寄附，故致贈名匠所刻觀音像。 12月1日，赴山梨縣北都留郡上野原町島田村鶴洲樓主人橫溝治郎之華甲壽宴，並為撰〈橫溝翁壽碑〉一文。
1930	昭和5年 70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古稀，結成千福會。又撰〈七十自壽序〉一文。 7月18日，參與大日本寒山寺落成式，後撰〈寒山寺記〉一文。 撰〈題支那革命史序〉一文。按《支那革命史》有二：一為吉野作造、加藤繁著，1922年由東京內外出版，1929年京都內外出版；一為長野朗著，1930年由東京改造社出版。不知佐倉所題者何？

1931	昭和6年 7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壽坂卷橘軒萱堂七十七序〉，祝賀坂卷氏（埼玉縣北葛飾郡幸松村人）母喜壽。 撰〈米舩田口翁碑〉，記田口氏勸建大日本寒山寺之經過。 代撰〈題高野長英遺著集〉一文。按《高野長英全集》（高野長英，1804-1850，江戶後期藩醫），高野長運編，水沢町(岩手県)高野長英全集刊行會出版。
1932	昭和7年 72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蕭堂存稿序〉一文。按《蕭堂存稿》，乃二松學舍同窗三宅君（1864?-1931。號蕭堂，1882年入二松學舍）之文稿。 為好友幡野桂水君撰〈賀幡野桂水君金婚序〉一文。按幡野桂水居山梨縣北都留郡上野原町島田村。 〈三十七年前の夢〉，收入《臺灣大觀》，日本合同通信社出版。
1933	昭和8年 73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夏期講習會，擔任講師。 10月，與二松學舍同人設宴於富士見莊，為即將赴韓、滿、中國之青洲濱君餞別，並撰〈送青洲濱君遊禹域〉以送行。 為友人撰〈凌海詩文集序〉一文。按《凌海詩集》，為醫學者司馬盈之（1839-1979）遺稿，由其子司馬亨太郎（1862-1936）。獨逸學協會中學校8代校長。彙編於昭和8年出版。
1934	昭和9年 74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蘆洲詩文集序〉一文。按《蘆洲遺稿》（上、中、下三卷），著名漢學家池田四郎次郎（1864-1934）著，昭和9年出版。 撰〈上大滿洲國攝政賀新政府建立書〉一文，倡同文同種之義。 夏期講習會，擔任講師（漢文新選）。 撰〈賀晚晴福島君喜壽序〉一文。 9月22日，晚晴福島氏於東京玉湖水源地議建神社，今廣瀨郡下文雅名流於湖畔舉行遙拜式，佐倉陪祭，並撰〈玉湖陪祭記〉一文，以記其事。 12月29日，往日暮里訪七条佐市郎（號竹雨。1892年創立七条紙商事株式會社），為其撰〈十瓢亭記〉一文。
1935	昭和10年 75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月，代撰〈山下義韶君七十壽序〉。按山下義韶，1865-1935，小田原藩士，柔道家。 5月，撰〈木本君華甲壽言集序〉。按木本氏，1875年生於千葉縣長生郡岩撫里，東京帝大法政科畢業，任職東京瓦斯株式會社，1915年任日韓瓦斯株式會社支配人，1918年任專務取締。 6月，遊大島，撰〈遊大島〉詩一首。 夏期講習會，擔任講師（士道要義）。 12月，《德川の三舟》，由東京康文社出版。書前有〈德川三舟自序〉，又撰〈書三舟書翰後〉。 撰〈小林松女壽碑銘〉。小林松為其友磯野君家之老婢，服勤四十年，欲祝其壽而鑄碑銘。 撰〈記烈女澤村氏事〉一文。烈女澤村氏，乃鄰居澤村淡岳妻，名利子（1878-1934）。（此繫年乃據其卒年推測）

1936	昭和11年 76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撰〈書南洲翁詩書後〉。讀龍文堂主人鯨島君藏西鄉隆盛〈甲僧月照詩〉書，感懷西鄉氏一生之豹變。 5月23日，與友人設宴於東臺精養軒，祝賀山田準（1867-1952）七十壽辰。並撰〈濟齋山田君七十壽序〉一文。 7月，為內藤久寬（1859-1945，越後刈羽郡石地村人，1888年創立日本石油會社）喜壽撰〈賀栗城內藤翁七十七壽序〉。 8月，與季子俠介及孫女，歸福島，並遊松洲（今松島）。撰〈遊松洲記〉一文，誌其所感。 9月，赴千葉縣成田町參加殉職巡查鈴木氏遺靈祭，並講演當時實狀。又，有客攜一鍛刀至旅館，求其辨識，因撰〈宗近鍛刀由來記〉一文，以誌所感。 10月10日，將屆喜壽之齡，又逢二松學舍創立六十週年，遂撰〈躋壽漫言〉以誌所感。 12月18日，在《孔教報》1卷3期頁10發表〈壽北水湯目君八十序〉。
1937	昭和12年 77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月，《達山文稿》，由東京達山會出版。 二松學舍創立六十週年，獲頒感謝狀。 撰〈大窪詩佛傳序〉，此為鈴木碧堂撰〈大窪詩佛〉一書之序文。按大窪詩佛（1767-1837）名行，字天民，號詩佛，常陸國（今茨城縣）人，江戶後期漢詩人，有《詩聖堂集》及《詩聖堂詩話》等。 撰〈追懷漫談〉一文，收入《二松學舍六十年史要》（昭和12年12月15日，二松學舍出版）。
1938	昭和13年 78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9月20日，《談藪》（漢文），由東京達山會出版。
1941	昭和16年 81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月15日，歿。諱名慧光院達山日照居士。 〈二本松少年隊の勇戰〉一文，收入《二本松少年隊秘話》（佐藤利雄著，霞ヶ關書房出版）。

案：以上表格內容，進行編製時，參考了下列文獻：

1. 《臺灣新報》
2. 《臺灣日日新報》
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4. 國史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查索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5. 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查索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時報、臺灣、蕃界、孔教報）。
6. 佐倉孫三相關著作。
7. 川邊雄大，〈明治時代的二松學舍生和台灣——以佐倉孫三為中心〉，「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主辦，2008.11），頁163-166。
8. 吉原達也網路論文，〈佐倉孫三氏關係資料一斑——日本統治下台灣警察史の一齣〉、〈佐倉孫三及比湯目補隆兩氏の足跡〉，二文查索日期2013.10.08。
9. 林美容，〈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漢學研究》28卷4期（2010.12），頁261-294。
10.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6）。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3.05）。
-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
-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
-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03）。
- 王曉平，《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4.04）。
- ，《亞洲漢文學》（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06）。
- 加藤周一著，彭佳紅譯，《21世紀與中國文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10）。
- 安田敏朗，《「國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日本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
- 佐倉孫三，《日本尚武論》（日本東京：東京教育社，1892.07）。
- ，《時務新論》（中國福州：美華書局，1905.03）。
- ，《達山文稿》（日本東京：達山會，1937.04）。
- ，《臺風雜記》（南投：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閩風雜記》（中國福州：美華書局，1904）。
- ，《談藪》（日本東京：達山會，1938.09）。
- 村田雄二郎，《漢字の近代》（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09）。
- 阮斐娜，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
-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日風俗一百年》（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11）。
-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02）。
- 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09）。
- ，《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 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5.05）。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03）。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
-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其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06）。
- 森岡綠，《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
- 黃美娥主編，《台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1895-194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12）。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04）。
-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6）。
-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
- 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 樂黛雲，《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 樂黛雲、金絲燕，《編年史：中歐跨文化對話（1988-2003）：建設一個多樣而協力的世界》（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9）。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6.03）。
- 橫須賀司久，《漢詩人列伝》（日本東京：株式會社五月書房，1997.09）。
- 齋藤希史，《漢文スタイル》（日本東京：羽鳥書店，2010.04）。
- ，《漢文脈と近代日本》（日本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7.02）。
- ，《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2005.02）。
- ，《漢字世界の地平：私たちにとって文字とは何か》（日本：新潮選書，2014.05）。
- 嚴紹盪，《比較文學視野中的日本文化》（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08）。
- ，《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06）。
- ，《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06）。
- 、中西進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學卷》（中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1996）。

——、劉渤，〈《中國與東北亞文化交流志》〉（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嚴紹盪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0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西村一之，〈蕃務本署調査課と「理蕃」：佐倉孫三を通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人間社会学部》24號（2014），頁17-32。

林美容，〈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風俗記錄——佐倉孫三所著《臺風雜記》之探討〉，《臺灣文獻》55卷3期（2004.09），頁7-23。

——，〈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的比較〉，《漢學研究》28卷4期（2010.12），頁261-294。

——，〈佐倉孫三與臺閩〉，《臺灣文獻別冊》46卷（2013.09），頁22-30。

黃美娥，〈國民·國語·國體專題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63-70。

——，〈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台灣文學學報》26期（2015.06），頁1-38。

（二）學位論文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三）研討會論文

川邊雄大，〈明治時代的二松學舍生和台灣——以佐倉孫三為中心〉，「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主辦，2008.11），頁163-166。

三、報紙文章

〈八日の羅漢會〉，《臺灣日日新報》，1911.01.10，7版。

〈改設學堂〉，《臺灣日日新報》，1901.11.26，3版。

- 〈清國勳章贈與〉，《臺灣日日新報》，1911.07.07，2版。
- 〈祭深岷大尉原林學士以下諸子文〉，《臺灣新報》，1897.08.22，1版。
- 〈福州武備學堂の開校〉，《臺灣日日新報》，1902.06.28，2版。
- 佐倉士誠，〈雲漢硯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0.03，3版
- 佐倉達山，〈望雪記〉，《臺灣新報》，1897.02.13，1版。
- 流石本島，〈臺北の書畫界〉，《臺灣日日新報》，1910.9.29，5版。
- 館森鴻，〈達山文稿序〉，《臺灣日日新報》，1912.05.17，5版。
- 蟪寄生，〈綴語誌慕〉，《臺灣新報》，1897.02.25，1版。

四、電子媒體

吉原達也，〈佐倉孫三氏關係資料一斑——日本統治下臺灣警察史の一齣〉（來源：
<http://home.hiroshima-u.ac.jp/tatyoshi/sakura001.pdf>）。

——，〈佐倉孫三及び湯目補隆兩氏の足跡〉（來源：<http://home.hiroshima-u.ac.jp/tatyoshi/sakurayunome.pdf>）。

《臺灣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國史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查索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查索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時報、臺灣、蕃界、孔教報）。

